

唐旭之譯

在和平勞動之國

桂林文化供應社印行

譯 之 旭 唐

國之動勞平和在

聯蘇在人工國外

述自的活生和作工

目次

原編者序.....一

問題表.....一五

黑媽媽成了突擊隊員（瑪加列特·格拉斯哥）.....一七

奇異的結合（西爾維亞·卡霞拉）.....二五

真正的紅利（丕德生）.....三一

燦爛的前途（烏爾霞立克）.....三四

成了蘇維埃代表（布塞克）.....四〇

言論自由（屈希利克）.....四五

同樣發明，同樣結果（弗蘭克爾）.....四七

蕁業難（柯齊亞）.....五〇

| | |
|------------------|-----|
| 偉大的同情（柯齊亞） | 五四 |
| 逃脫了羅網（斯特恩） | 五八 |
| 求知慾（莫格） | 六二 |
| 一個學生的比較（都爾乞夫） | 七〇 |
| 我過得很好（李麻子） | 七七 |
| 工作與學習（李泰） | 七九 |
| 科學與體面（阿爾藤吞） | 八一 |
| 一個女教師的經歷（莉拉·亞希比） | 八八 |
| 巨大的變化（高德佛來） | 九五 |
| 自由（弗蘭克·費利普） | 一〇七 |
| 計劃的好處（亞諾德·塔斯汀） | 一一五 |
| 他們都需要和平（約塞夫·海爾） | 一一八 |
| 夢想實現了（卡爾米勒） | 一二二 |

| | |
|----------------|-----|
| 從斯卜里到伏爾加（克魯卜希） | 一二五 |
| 工作滿意的國家（魯夫希支） | 一二八 |
| 果然是真的（利希特） | 一三四 |
| 蘇維埃法庭（鐵爾曼） | 一四一 |
| 我的理想（麻拉達拉） | 一四六 |
| 知識之門（塔利——凡蒂） | 一五三 |
| 武裝保衛蘇聯（瑪爾契利） | 一五七 |
| 譯後記 | 一五九 |

原編者序

「招請旋盤工人及輪磨機工人」

「招請木工，砌工」

「招請工程師，技師，專家」

「招請信差」

「招請簿記員及油漆匠」

「招請鋸字工人，排字工人，印刷工人，裝訂工人」

這類廣告充滿着蘇聯的報紙。這類廣告遍貼在蘇聯各工廠，印刷局，電力站和建築場所的大門上。

在蘇聯正進行一種偉大的建設工作。人生正在被改造。幾世紀以來俄國沙皇們和地主們把這國家束縛在亞細亞的落後狀態中。俄國資本家們掠奪了俄羅斯巨



大的天然富源，剝削工人們到了極頂。現在，一萬六千萬人民，因偉大的十月革命而擺脫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的羈絆，正在盡其全力使生活繁榮而且幸福，要精通科學和機械，並要儘量在最短時期內趕上與超過目前在技術和經濟上最進步的國家。

一個多麼龐大的事業啊！雖然蘇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仍然沒有足夠的人手來做這一切工作。

外國的讀者們，你們一讀此書後便會看出，你們僑居蘇聯的國人最成驚奇的事乃是：在這兒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無論怎樣，誰想要做事，誰就有事做。那些不懂得怎樣做的都可以有機會學會，如中國少年李麻子學會了駕駛複合旋盤（註一），像其他成千的非熟練工人一樣——中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捷租人。

這與資本主義國家是何等鮮明的對照！

蘇聯的讀者們，你們一讀此書便可知道，在蘇聯國界以外到處都是失業，無

數男女一連幾年無法謀生，人們爲求工作和麵包而漫遊各國，飄洋過海，處處得到同樣的答覆：沒有工作！即使一個職業找到了手，仍然隨時可以失掉。對於明天是沒有保證的。對於他們自己和家人是沒有保證的。這與蘇聯的情形是何等地不同！無怪乎本書許多封信的作者們以異常感激的心情自述他們在蘇聯不需要爲他們子女的前途操心，因爲他們知道子女們將來一定能夠工作，能夠學習，而且，如果高興的話，還能夠進大學。

但是問題中心不僅在蘇聯有工作給一切人做。是什麼性質的工作呢？爲誰而做呢？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呢？「我所驚奇的是這兒工作時的自由空氣和工人與管理員之間的友愛關係，」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內一個奧國機匠伏克賽爾如此寫着。「誰也不在監督或管理員之前屈膝。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某種大家庭或大集團中的平等份子。」「我在這兒有和其他任何人一樣的權利，」查坡諾齊一個保加利亞油漆工彼得洛夫這樣寫着。「我認識本部所有的工程師和技師，有些是我的好朋友。有時候，如果我的上司們對我的工作指示不正確，我去告知這些同

志，錯誤就糾正過來了。他們不但聽信我的話，并且還向我道謝。」這也是不足為異的，因為在蘇聯，全體人民都為一個大目標（建設社會主義）而工作，「每一個工作者的每一個成就都是全體的勝利，」——查坡諾齊的一個奧國電機師魯普如此說。

一個奧國工程師，弗蘭克爾，敘述着一個有趣的實例（註二）。他發明了一種器械，可使電氣工程中一種最困難討厭的手續機械化。弗蘭克爾從前所服務的資本主義工廠和社會主義的「列甯格勒電氣用具工廠」都曾採用了這種器械。結果如何呢？兩邊都是一樣節省了好些人力。但是，資本主義的雇主把這些多餘的工人遂到街頭去推餓，而在蘇聯他們卻轉到了更適宜的，更熟練的和報酬更多的工作。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男人女人不是牛馬，不是被榨取和生利息的工具，而是最貴重的資財。因為「世界上所有一切最寶貴的資本，最寶貴而最能決定一切的東西，就是人，就是幹部，」（註三）斯大林這個簡單明瞭的定理，是蘇聯一切事業的基本原則。一個資本主義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在為佔有該企業的資

產階級繁衍利息，而蘇維埃一切工廠，作坊和鑛山的終極目的卻完全不同：是在改進全體人民的生活，使之更加繁榮更且幸福，是在鞏固蘇聯——偉大的自由勞動的國土。

在蘇聯沒有失業，公衆福利是在年年增加着。自然，對每樣東西——報紙，傢具，住宅和無線電收音機——的需要是很大的。已開工的各工廠在切實地提高生產。每年有新的工廠開工。然而這種大量而且不斷地增加着的貨物出產，並不發生存貨積滯的現象；它完全被增加着的需要所消費掉了。「這種使我特別喜歡的是：你在工作中不會遇到一點挫折，無論何時總是在增加着生產，」康斯坦丁諾夫卡錚工廠一個德國專家海爾（註四）寫着。「當我在這裏的三年中，我從沒有看見任何地方有生產萎縮的現象。在蘇聯是不知有危機的。」

的確，在蘇聯是沒有危機的，并且永遠沒有發生危機的可能。蘇聯各工廠都是按照計劃工作。它們絕對不會發生像資本主義各企業間那種凶殘的競爭。它們不需要去追逐那些不可靠的偶然的定單。它們所接到的定單都是巨大而且可靠的

，它們老早就先準備起來。『蘇聯工廠比別國工廠的一個重要優點是在於它們的工作都是按照一個預先規定的長期計劃，』『斯大林冶金工廠』一個德國主任工頭羅沙爾斯基寫着。『在此種情形之下，人們對於明天有充分的把握；他們不必擔心在明天也許因為無人定貨的緣故爐子會停熄下來。』

這種對將來的安心，對明天的安心，不僅感動住在蘇聯的人們，而且感動了遊客。荷蘭科學家望·符勒吞，出席『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會』的一位代表，很生動地寫出了他在蘇聯所得的主要印象，他說：『在蘇聯人們都興高采烈，熱心工作，因為他們都信任將來。』這種『將來』并非牧師們所說得天花亂墜的『天國』，亦非只存在於夢想家幻影中的『理想國』。它是實際的明天的將來。它是每天變得更加真實更加明確的將來。

一個英國人愛力克·高德佛來，（註五）如此寫着：『第一屆五年計劃集中於建設重工業——一切產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和奠定社會主義農業的基礎。這期間大量投資之所以可能是有賴於工人階級自願的犧牲。一切食品供給都受了限

制，奢侈品是絕跡的，衣服也很難得到。可是，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使輕工業的發展和消費品的生產有了可能，而社會主義農業的勝利則使糧食日益豐富起來。結果是我們看見了過去兩年中巨大的變化。一切城市裏面出現了大批頭等的現代化商店，其中充塞着各式各樣的貨物，而且貨物的品質也在不斷地改良。」

蘇聯是在沿工業化大道迅速前進着。現在它不但有了大規模的迅速發展的工業，而且有了精通技術的人才：組織幹部，執行幹部，工程師，熟練工人，科學家。這種人才的數目每天增加着，他們的資格也在迅速地提高。他們學習着，在研究院中，在工藝學校中；他們學習着，在工作中，在實驗室中；在打機台上，在新建築的鷹架台上；同時他們自己又教出了成十成百成千的新工人。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軍，無論質或量，都在迅速增加着。因此蘇聯能夠規定而且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個更比一個偉大的新任務——莫斯科市的全部改造，白海——波羅的海運河與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開鑿，莫斯科新地道的建築，新鐵道的建

築，幾百個工廠和作坊的建築，電力站和學校的設立。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蘇聯能夠在經濟方面更進一步免除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

關於這點的一個光榮證據便是斯泰哈諾夫運動。這運動之所以得名是由於頓巴斯青年鑛工亞力克賽·斯泰哈諾夫。他把自己的工作和同隊其他諸人的工作組織得這樣地好，以致他立刻開始在每一次輪班期中採出了一百噸以上的煤，以代替通常的七至八噸。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杪的事，斯泰哈諾夫的榜樣燒熱了千萬工人們的心。斯大林說得好：『斯泰哈諾夫運動不是慢慢地而是以一種無比的速度，像一陣狂風暴雨一般，傳遍我們蘇聯各地。』（註六）從蘇聯的各個角落，從一切工廠，作坊鑛區和建築工程，消息如雪片飛來：工人們已經開始把出產超過先前兩倍，三倍，六倍，以至十倍。

所有這些工人們在先本已學好了他們的行業，本已懂得機器的構造和作用，已能夠控制這些機器。但是斯泰哈諾夫的榜樣打開了他們的眼睛，告訴他們：在能幹的手中，加以良好的工作組織，機器和人可以把生產無限地超過通常所謂

的『正規標準』。

蘇聯工人們既增加了生產，因此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們自己的收入，除此之外他們還完全明瞭，在社會主義國土是沒有也不能有失業的。一切人都有工作。

人人都知道這還只是一個起頭，還有很多工作等在前面。在蘇聯誰也沒有閉眼不看這一事實，今日蘇聯的生活是還有許多缺點的：住宅問題仍舊存在，許多貨物的品質還不夠佳，過去遺留來的某種文化缺少的狀態還待克服。蘇聯政府和工會，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天天在不屈不撓地努力克服這些缺點，而且在這種努力中頗收成效。他們得到各種蘇維埃報紙的協助，從手寫的壁報和本國製的漫畫到日銷數百萬份的大報。他們每天奮鬥着，要使工廠出產更多更好的貨物，要建更多的房屋，學校和俱樂部，要用更有效的方法來組織工作，更加要改良工人，農人，工程師，農業學家，工頭和教師的生活，要使兒童更加健康，更加幸福，並在學校中學習得更好。

一個龐大的工作正在蘇聯進行着。人生正在被改造。各民族的勞動人民——

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第猶克人和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和吉爾吉茲人，白俄羅斯人和土庫曼人——手攜手地工作着，正如一家人一樣。卑劣的民族仇恨在他們已成了過去的事，並且他們竭誠歡迎別國的人來參加他們的大勞動家庭，如德國人，中國人，英國人，黑種人，捷克人，朝鮮人——一切確願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新生活建設的人們。外國生長的工人們在資本主義各國所常常遭受的侮蔑，在這里是毫無痕跡的。沒有一個人會因為別人不懂這國的語言或是膚色不同而譏笑他。請讀一讀黑種女子格拉斯哥，伊朗人塔利——凡蒂，朝鮮人李素，中國人張平和李麻子（註七）諸君的信，你就會認識國際勞動關係的偉大進力量。

蘇聯人民以同志的熱情接待一切工人，不問他們的種族或國籍。蘇聯工人階級更以特殊的熱情歡迎那些積極反抗資本主義壓迫的戰士，歡迎那些從法西斯主義下逃脫出來的囚徒，歡迎那些革命戰鬥的英雄。奧國工人柯齊亞的信（註八），生動地描寫着蘇聯的兒童們是怎樣地向他們的本階級同志表示親愛，怎樣急切地向奧國革命英雄的兒女表示同情。

住在蘇聯的外國工人和工程師，與蘇聯公民一樣地參加國家的公共生活。他們可以選舉蘇維埃代表，也可以被選——譬如在列甯格勒的奧國人布塞克，在莫斯科的德國人利希特，「哈可夫牽引車工廠」一個捷克工人的母親塔斯卡亞。

（註九）他們參加工會學校委員會，住宅委員會，以及各種娛樂組織。他們盡量利用學習和教育的機會——許多的信在熱烈地表現着他們是怎樣努力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斯大林的學說，怎樣增進技術知識，怎樣學習俄語——他們的新的無產階級祖國的語言。

在蘇聯一切勞動人民皆受尊敬。工作努力的外國工人和工程師，受尊崇，獲獎金，得勳章，完全和蘇聯公民一樣。現今已有好些外國人獲得了「勞動紅旗勳章」——社會主義勞動的榮譽標幟。

住在蘇聯的外國人可以親眼看見人民是怎樣發展着，困難是怎樣克服着，社會主義是怎樣建設着。他們可以親眼看見蘇聯不需要戰爭，不需要擴展疆土，不需要剝削被奴役的人民。它以自己的資源建立着一萬萬以上人民的新生活，為全

世界的勞動者樹立一個模範。蘇聯一面保衛着它的邊疆，以防帝國主義強盜們可能的進攻，一面竭誠地推進着它的和平政策。在蘇聯各企業中工作的許多許多外國人都會同意一個丹麥——美國人丕德生（註十）所寫的這個簡單的真理：

「我在蘇聯看見怎樣建立起了一個嶄新的更好的人類社會的基礎。我把這些明明白白的事實寫給全世界的男女工人們看！使他們懂得這一個真理：工人們若要解除經濟的奴役，獲得享樂生命的權利，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

本書是在蘇聯工作的外國人們一些書信的集子。

這兒略敘它的緣起。一九三五年春，「重工業人民委員會」機關報「工業化」（Za Industrializatsiyu）向蘇聯各工廠，作坊和建築工程中的外國工人們和專家們發出了一張問題表。後來收到了許多回信。該報五一節專刊發表了一些信的摘錄，因限於篇幅，未能全部發表。因此決定把這些信彙為專冊出版。在這本書中，國籍不同語言不同的人們——民族，職業，年齡，技能都不相同的男男

女工——工人們，工頭們，工程師們，科學家們，敘述着他們在蘇聯的生活和工
作，以及目視而且已經熟悉的種種新奇有趣的特點。

我們唯一的遺憾是這些信沒有說及斯泰哈諾夫運動，因為斯泰哈諾夫運動係
起於一九三五年秋，當時這些信業已收集攏來了。

但是從這些信裏面已經可以看出對於勞動的新態度，那就是斯泰哈諾夫運動
的基礎，而且後來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事實上，這些信的許多作者自己就是當今
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

編者：羅森布利特

許 勒 爾

（註一）見本書第十四篇。——按本序文附註皆係譯者所加，後不一一聲明。

（註二）見第八篇。

（註三）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幹部決定一切」一文。

（註四）見第二十四篇。

(註五) 見第二十篇。

(註六) 見「列寧主義問題」斯泰哈諾夫運動的歷史意義及今後任務一文

(註七) 見第一、三十一、十六、十五、十四諸篇。

(註八) 見第十篇。

(註九) 見第六、二十八、十七諸篇。

(註十) 見第三篇。

問 題 表

(一) 你在本國做過什麼事，在蘇聯現做什麼事？

(二) 是什麼原因使你到蘇聯來？

(三) 你在蘇聯覺得怎樣？

1. 對你所得到的工作滿意嗎？

2. 對上司待你的態度滿意嗎？

3. 與身邊諸人友善嗎？

4. 學俄語嗎？

5. 對蘇聯工人們和工程師處理工作的態度有何意見？

6. 對你的住宅，食物等項滿意嗎？

(四) 你的家庭在蘇聯情形如何？

1 你的妻子喜歡這里嗎？

2 你的子女是否已入學校？他們在學校是否高興？你的幼小兒女（五六歲以內者）是怎樣養育的？

3 他們在蘇聯兒童們中間有朋友嗎？

4 他們在閒暇時間做些什麼？

（五）你怎樣消磨你的暇時？上俱樂部去嗎？看戲嗎？看電影嗎？讀書報嗎？是外國的還是蘇聯的？

（六）你覺得在你工作的場所應當還有那些主要的改進？

（七）你在蘇聯的時候你是否已經深信這個國家是在為經濟與文化的和平發展而力求和平？

黑媽媽成了突擊隊員

以職業論，我是一個理髮匠。我曾在紐約最上等的理髮店裏工作。在那裏有一種奇特的薪金制度：理髮匠從老闆那兒拿不到任何薪水，只能從顧客所給的錢中抽出一定的成數。在『繁榮』時期，工作是很多的。錢也賺得不少。那時我甚至於還能夠有點兒積蓄。但是以後經濟恐慌的艱苦日子就來到了。顧客一天一天地稀少起來。老闆並沒有開除我們——把我們留住對於他還是有利的，因為，究竟說起來，他沒有付什麼錢給我們，而我們倒替他賺進了錢。

事情一天比一天糟。即使偶然有一個顧客走進來，他總是去光顧白種的理髮匠，而避開了我，因為我是一個黑人。差不多三年我沒有賺得一點東西，同時自然也沒有得到一點失業救濟費。我把所有的積蓄都用光了。我賣掉了所有的東西，生活得非常窘迫。最後我放棄了理髮業去替人家洗滌東西。但是洗滌工作賺不

了多少，那樣子幹我只能得到幾分錢。

我的兒子，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正在一個電影場裏學習。在美國，黑人是難得進專門學校的，可是在電影上一個黑種人却正是所需要的人物。我大為快樂。『至少他是可以生活得像一個人樣了，』我如此地想。

好，我的兒子從電影場畢業了，而我的快樂也就告了終結。沒有地方肯給他工作，他失業了很久。這期間他常到某個地方去，而且似乎為某些事情忙着。

——我不懂是什麼事情。後來他告訴我，他已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有一天，我做了洗滌工作回家，正疲勞不堪而且餓得半死，忽聽得一片鬧聲，看見一羣人在我們的住宅前面。

『怎麼一回事？我的孩子……』

我們的房子被搗毀得一塌糊塗——窗玻璃打碎了，傢具搗爛了，許多東西被拋到街上。

『你那個小畜生那裏去了？你那個黑種共產黨藏在什麼地方？』野蠻的聲音

向我咆哮着。

這是可怕的，但是我倒安心鬆了一口氣。原來這些三五黨人並沒有找着我的兒子。

我胡亂地在外遊蕩。我在每一處都受了驅逐——不僅因為我是一個黑種女人，而且因為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母親。最後我與一些黑種朋友找到了一個躲避的地方。我的兒子則已經失蹤了。

許多時候過去了。我哭泣，我傷心。後來，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出乎意外地，有人祕密地交給我一封信，信封上打着許多外國郵局的戳記。

我發着抖撕開了信封，曉得我的兒子已經和一羣同志走到一個遼遠的國家去了，在那個國家住着一個英勇的民族，他們推翻了他們的沙皇，富翁和一切資本家，在那裏一律都是平等的——黃種人，黑種人和白種人。

『媽媽，』我的兒子寫着，『在這兒生活緊張得如像一壺沸水。工作太多了，沒有足夠的工人來做。在這兒沒有人注意到我的黑皮膚。只是開或有些孩子們

碰見我時會叫喊——不是輕蔑而是驚異：「看呀，一個黑人！」拋掉你的一切，到蘇聯來和我們一塊兒生活吧。」

我滿心歡喜，可是又滿懷疑慮我能夠做什麼事呢？不過是剪髮，梳頭，修面……教育我受得不夠，剛剛只能讀寫。我甚至於不明白俄國人在爲了甚麼奮鬥，以及在海洋的那邊爲何發生過一場那樣可怕的戰爭。並且我的年齡也不青了。我就會十分地衰老起來……。

然而我兒子的信終竟使我充滿了一種迫切的慾望，要求知識，要去奮鬥，爲了我的被壓迫的人民，爲了我的兒子，爲了我自己，爲了一切工人——白種的，黑種的，黃種的。

我於是盡力閱讀雜誌和報紙。它們寫着布爾塞維克黨是野蠻人，對於文明是一種威脅，在俄國正鬧着饑荒。我不信。我豈不是有我兒子的信在衣袋中嗎？他不會對我說謊的。我準備啓程，而剛在離開之前。我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我到了莫斯科。由於習慣的緣故，我預料在那兒的白

種人，如在別的一切地方一樣，會以敵意來對待我的。但是令我大為歡喜的是我所發現的恰巧相反。「同志，」——這就是我所聽到的第一聲。我覺得俄羅斯人的態度有一種稍微粗魯然而和藹可親的坦白。我覺得舒適，在我自己的人羣中，在我自己的國度中。

我的兒子來迎接我。他微微含笑——坦白而有自信的樣子。他帶我到一個名叫「亞爾巴特」的地方，他的住宅就在那兒。他在一個影片托辣斯內工作——總是與高采烈的，享着人生的樂趣，學習着。總是忙着。總是興奮着。

我和他同住了半年。於是我開始覺得煩悶起來了。不是因為離開了紐約——不，不是因為這個——而是因為沒有事做。無聊地閒坐着我過不慣。我決意要找一項工作。只是不要再在理髮店中。要在一個工廠裏面，和工人們在一起，生產着東西。我所認識的一個老同志勸我到「斯大林汽車工廠」去試試。可是我做什麼事好呢？我是沒有專門技能的。

「你馬上就可以學會的，」我的朋友說。

於是我跟他到工廠裏去。在那兒選擇了（在美國有任何人能夠這樣做嗎？）最適合於我的工作——在電氣修理間纏線。

這巨大的工廠弄得我眼睛都花了。起初的幾天很感困難。但是在我旁邊做工的女人們，男人們和青年夥子們打手勢教我怎樣地做。工頭用着親切的同志的態度把一切解釋得很簡單明白。我於是一點點地弄習慣了。在車站上我所聽得的的第一聲是『同志』，在工廠裏却是『突擊隊員』。他們解釋給我聽那是什麼意思，我就立刻簽名做了一個突擊隊員。最初兩個星期我得到三十七個盧布，可是以後的兩個星期就已得到了六十五個盧布。與我一塊做工的同志們拍拍我的背，說了些什麼，微笑着。他們似乎在慶賀我『精通了技術』。

每天我去參加會議。我坐下聽講。我只能靠着直覺去辨別那是說的什麼。他們是在說我們必須做得更好更多，使我們的祖國長大而且強盛起來。

我離開了我的兒子。這意思就是說從亞爾巴特到我的工廠相距很遠。現在我是和英國人們，日耳曼人們，列特人們同住一座住宅裏面。我已完全忘記了我是

黑種人。我只簡單地覺得是一個人，就是這樣。我得到一張突擊隊員的食堂優待券。

當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我穿得好，吃得好。但是我知道，在被敵人包圍着的時候，要建立一個幸福的社會主義的生活不是容易的事。這需要我們去儘快地克服一切困難。

不久以前我曾獲得有生以來最大的驚喜。他們喊我到工廠黨委員會的辦公室裏去，由一個翻譯員的傳達，對我說道：『瑪加列特同志，我們想送你到大學裏去讀書。』

我興奮得幾乎失聲叫喊。噢，在美國，學院和大學對黑種人差不多是封鎖了的。在這兒他們却要我——一個老婦人——去進大學讀書。是真的送我去了。當然我同意了。如今我正在大學一年級學習。我特別專心致志地研究俄文，政治經濟學和聯共黨史。

我彷彿已經年輕一些了，像我兒子一樣，我在時時刻刻地忙着。我為我們的

報紙寫作，成了一個工人通訊員。我讀報紙雜誌——當然，是英文的。我在閒暇時候到「外國工人俱樂部」去，學習并預備我的功課。有時我去看電影。但是我還沒有閒空到戲院或歌劇院去。不懂語言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妨礙。然而，我覺得十分舒適，與我的同道工作的同志們，與工廠，與全莫斯科，與全國，都已結了交情。現在我是真的在生活了！

美國：瑪格列特·格拉斯哥——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女工

奇異的結合

「繁榮」的時期，我們一般年青的美國人過着一種無憂無慮的生活，未嘗有片刻兒想到「世界」問題。我們工作得很多，而享受的樂趣則更多。這世界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一個奇妙的樂園。但是突然之間，某種爲我們所不料亦所不懂的東西降臨到我們的國家來了：就是危機。成千成萬的人失掉了工作，開始遷居到更廉價的區域。我的父親失了業。我的姊妹們也把他們的位置失掉了。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開始對經濟學發生了興趣。我初入這個新的觀念世界的時候，讀的是司徒亞特·柴士（Stuart C. Chase）的著作，其後我繼續左傾，直至達到馬克思爲止。這似乎是一條很彎曲的路，但是你必須記得，在華盛頓州可濱刺小城我所入的師範學院內，就連馬克思的名字也是小心掩蔽着不讓我們知道的。

我在赫斯特系新聞托拉斯芝加哥支行編輯證券市場新聞，很受器重，拿得一

筆好薪水。我的丈夫史佛夫（蘇羅）卡霞拉在一九三〇年畢業於伊利諾亞大學，其後便開始在威斯康新大學講學，不出三年，得到了化學博士的學位。如果不是必須幫助我們的失業親族的話，那麼就是在蕭條時期，我們也不致於生活得壞。

杜邦化學公司的經理部願意給我丈夫一種工作，但是他拒絕了。他說：「我不願在一個軍火工廠內工作。」他又告訴我道：「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其科學是前進的，而不是後退的；其目的是建設，而不是毀滅。那就是蘇聯。我們必須到那兒去。」我贊成他的決心。我早就被新俄羅斯所吸引住了。

命運玩弄人玩弄得很奇怪。恰巧我倆的父親都是在俄國生長的，當年紀還青時，就逃出了那沙皇治下的悲慘的祖國，到美國來尋求「自由」。我的父親名亞伯拉罕，寶希，是從敖得沙附近一個小鎮來的，我丈夫的父親則來自芬蘭——當時俄羅斯帝國壓迫之下的一個省區。那時是在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而二十年光景之後，他們的兒女卻在啓程由海道回到那勞動勝利的國土。青春時代所憧憬的地理已經改變了……

種種的議論紛至沓來，勸誘我們不要到蘇聯去。對蘇聯「懷好意」的自由主義者告訴我們說，在俄國一切食物都輸出國外換機器，因此我們將只能靠黑麵包和鹹魚維持生活。蘇聯的敵人，大部分是赫斯特系報紙上評論著者，竟堅謂俄國的母親們爲了免得餓死起見，不得不吃掉自己的孩子。我們並不信這一切的故事，可是我們仍然料定吃苦是在所不免的。當我丈夫接到赴蘇聯去工作的邀請書時，我們不待簽約，就以遊歷者的資格出發了。其時是一九三四年八月。

我們以微賤的三等艙客的身份渡過了大西洋，因此，由於到達列甯格勒時坐入迎客的林肯牌精美汽車，以及在阿斯托里亞旅館住得華麗的房間，我們遂感得了分外的驚異。我們看見一座美麗的城，幸福的衣食充足的人們，堆滿貨物的倉庫。我們又驚又喜，決意永遠定居在這奇異的國度裏，雖然我們費了不少麻煩才使我們的護照延長期限。

現在史梯夫是在「列甯農學院」研究員伐維諾夫實驗室內工作，他對這工作非常喜歡。至於我呢，我對於我在蘇聯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分都真正

地感得興奮。我曾在美國教育兒童，在這兒我被外國語高級班聘去教學。我教的是高年級學生的會話——自第七學期至第十學期。在這兒使我吃驚的是蘇聯這麼多人對透澈地尤其是積極地研究外國語所表現的興趣。在美國，外國語是不及此地這樣教得好的。學習外國語的大都是想要致力於科學工作的人們，他們發現，具有一種純然消極的外國語知識就是以閱讀和翻譯科學教本了。

可是在我看來，這種對研究外國語的積極態度只是此地人民羣衆中普遍的積極性的一個例子，甚至於美國人（他們通常決非熱心的人），一到俄國之後，也被瀰漫在這兒的活潑精神，愉快和青春之力所感染了。爲證明這一點起見，關於在「列寧格勒文化院」維堡區所組織的「英美業餘劇團」說幾句話大概不會是不適宜的。從美國來此已有三年而且諳習俄文的亨尼倫把吉爾與（Mishon）那部愉快的喜劇「奇異的結合」譯成了英文。我們全團把譯本讀過，而且盡其所能加以修改。莉拉·巴克門充當舞台主任，我們在她的指導之下小心演習。進行很順利，因爲我們全體都被這劇本的光輝燦爛的意境——集體科學工作的意境——所

吸引了，並且我們都喜歡那浸漬在每一幕裏面的辛辣的幽默味兒。

我被派定扮演拉泰莎，我的丈夫則担任德華利一角。賴特曼，在化學物理研究院工作的一個美國人，扮演科可第亞。譯者亨尼倫，森林學院的一個研究員，扮演格羅霞。伐爾瑪，在五金學院實驗室中工作的美國人，扮演奧勒格；他的妻則扮托尼亞。哥爾斐爾德，旅行社的一個工人，扮演配第亞。蘇格蘭格拉斯哥人賴利。庫欽斯基，出版合作社的職員，扮演依利拿。工廠工人弗倫克爾扮拉司第亞，曼培格扮經理。

除了哥爾斐爾德之外，我們全體人員在美國時連客串也是沒有參加過的。「奇異的結合」在兩種意義上對於我們全體是一個初次的冒險：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登台，這是一點；其次呢，我們所演的是一個蘇聯戲劇——描寫着一種新的生活。

我們都興奮得要死，而且，說句老實話，都相信結果一定是一團糟。當不耐煩的觀衆鼓掌催幕的時候，我們之中有一個說道：「這就是我們今夜所能聽到

的唯一的掌聲了。」接着另外一個人走到幕後來告訴我們說，觀衆并不是外國人，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而是懂得英文的俄國人——大學，工藝學院和軍事學院的學生們，專家們，工人們——總而言之，是曾經看見「奇異的結合」用俄語在一個真正劇院內上演的人們。

使我們又驚又喜的是，這場上演進行得很順利，而且可以說，頗爲成功。我們把「奇異的結合」演了兩次——一次在維堡區文化院大廳裏，另一次在維堡區一個工人俱樂部裏（因爲廳堂容不下的緣故有許多人抱向隅之嘆。）

人——我們合夥兒的演劇工作使得我們全體成了好朋友。事實上，蘇格蘭人賴利·庫欽斯基和美國人亨尼倫還結成了夫妻。而整個地說來，「奇異的結合」在聯蘇我們全體這一點上發生了奇異的作用，我們——工程師們，工人們，學生們，科學家們——依照美國社會的慣例，是應該各自固守着各自的身分，彼此隔離的。史梯夫和我已經決意永遠地留居蘇聯，做蘇聯的公民。我們不想再回到資本主義的美國去了。

真正的紅利

和「羣自美國來的工人遊歷者」道，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越過芬蘭邊境而進入了蘇聯。在一個鄉村小站等待着運我們到列寧格勒去的俄國火車的時候，我和龐大而且熱誠的俄羅斯人民作了第一次友善的接觸：這些人民我以前僅在年紀還很青的時候，從譯成丹麥文的俄國文學中知道過。

我在蘇聯最初幾天的回憶是最愉快的。這絕不是爲了我所受到的感戴公正的待遇。現在我已「在斯大林格勒『牽引機工廠』做了四年。但是在第一一年之後，我便已經覺悟我從此再也不能讓自己附屬於殘忍的不顧人道的私人剝削的統治之下了。再也不能做一個迫在騙人的廣告後面各處尋求工作的人了。在美國和其它地方的工廠已經變成了工業的「瘋人院」；在那兒就連最好的工人們也因為工作的忙迫，因為被種種詭計陰謀，減低了的工資，因為隨着這制度而產生的一切卑賤

以致趨於絕望的境地。美國，雖有它所誇耀的倫理和民主政治，雖有它那一切的教會組織和理想的友愛關係，却允許銀行把工人們的些微積蓄賺了去，搶了去，而令他們及其家屬不免於貧困和死亡。無數的工人們，無論男女，被拋到了街上，成爲「乞丐」和「貧民」，直至老死，而另一方面，却讓不正當營保險者大發其財。

我是一個工人，在蘇聯是怎樣生活的呢？我樂意於我的工作。我以一個工人和機械師的身份受人尊敬和賞識。我和本部的領袖們以朋友與同志的關係一道合作。從沒有感得失業和經濟窘迫的恐怖。我可以在寧靜中生活。工作！我有一千個盧布存在儲蓄銀行裏，我若要用，隨時可以提取。由於我的賺錢，我的妻也有她自己的私蓄，數目與我的相等。除此以外，我還有兩千盧布以上的工業公積票。

然而在我看來，蘇聯生活最快樂而且最合人情的一面乃是夏季的休假，這是一切工人都有權享受的，而我却在以前從來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雖則我還沒有

上九歲時就一直在工廠中做着工。一九三二年，我受邀請和俄國的青年男女工人一道航遊伏爾加河。這花費了許多天，這一切費用都是公給的。一九三三年我參加了伏爾加河的大旅行隊，隨同當官人，也是從蘇聯及蘇聯工廠與礦區來的外國籍的突擊隊員。一切費用和薪款都是付過了。這一切二年我在北高加索附近一個製糖院過日子，那裏的糖期少，用糖用糖者還得從外地的糖廠弄來。以前我在倫敦於我未曾有過如此的可其大無窮的種種困難。我有生以來，且這是我第一次給了我真正的紅利。

我在蘇聯看見怎樣建立感。一個嶄新的更好的人類社會的基礎。我把這些明白白的事實寫給全世界的男女工人們看，使他們懂得這在一個真理：工人們若要解除經濟的奴役，必須得要求生產的權利，必須得要求自己的力量。

美國：丕德生——斯大林格勒牽引機工廠機械師

燦爛的前途

當我年紀還輕的時候，我就離開奧大利到美國去，在那裏住了二十六年。我從一個工藝學院畢業後，在印第安那州一個小工廠——「道奇汽車工廠分廠」——服務了很久，在冷鑄鑄造工程師。

我過得很好，在工廠裏保持着一個好地位，我的薪金很不差，我還有一棟屋和自己的汽車，有許多年，我是美國社會黨黨員，而且在黨中積極工作。

我最初對該黨政策的正確性發生懷疑是在它投票贊成美國參加世界大戰的時候。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了革命，繼之以內戰。黃色報紙對布爾塞維克人盡極譏毀謗之能事，說他們如何野蠻，如何殘暴。它把他們描寫成專好毀損美術文藝的野蠻人和文明破壞者。我不相信這些謠言，於是我就盡力去探訪蘇聯的真相，蘇聯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對於這，就連腐敗的美國報紙也不能全然裝聾做

（譯）顯示了布爾塞維克黨政策的正確性。蘇聯變成了美國所有前進工人和進步人民的興趣中心。自然，我也是擁護蘇聯的一分子。

不久危機在美國開始了，隨伴而至的是可怕的失業。我對蘇聯的同情更加強烈起來。每個人都感到資本主義國家是在沒落之中，只有蘇聯是在動盪地前進着。

我，因為是一個優秀的專家，尚未受到失業的影響。只有在我離美前的四個月才丟掉了工作。使我離開美國的原因，與其說是本身的貧乏和困苦，倒不如說是我看不出自己有任何前途——關於我的孩子們也是同樣的情形。我的大兒子已經學習了兩年的汽車工程。在那個期間，他沒有一次能夠在一個工廠裏得到一項工作，藉以實習一下。最後他只得在一個汽車停貯所充當看守人，在那裏他祕密地利用停貯在所中的汽車，才得到了「實習」的機會。

同樣的命運在等待着我的次子。

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湯姆生（一個很好的工程師），失了業，到處找不到

職業。他負了重債，瀕於窮困了。最後他找得了工作——做真空清潔器的推銷員。只要得了一件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

我決定離開美國到蘇聯去。我知道那個國家正是處在困苦期中，但是我準備去吃苦。

我從美國儘可能地把我所有的東西帶走，連傢具汽車都在內。

那是在一九三三年。自然，我立刻就找到了工作——在斯大林工廠當冷鑄部的指導員。我的大兒子也在這個工廠裏做了五個打樣師。我的第二個兒子進了這工廠附設的職業學校。

起初，的確是很困難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找一個地方居住。在美國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每個屋裏都擁擠的房產，特別是舊機器和失業的耕種者。而在莫斯科最困難的卻是找房子，因為對住宅的需要是非常廣大的。這樣我只好把東西寄到別處，我們自己就借居在同志和熟人的家裏。後來我們才在城外找到了一個房子。我和我的兒子都不在乎這些，因為心知將來情形就會改善，但我的妻卻覺得厭煩。

了，便跑到捷克斯拉夫一個親戚家裏去住了下來。

最近我們在距工廠不遠的地方找到一個房子，我和兒子們現在都住在這裏，早幾天以前我們又得到另外一間房子，所以我正要我的妻子回來。

我們三個人的薪金都不少。我每月可賺得四百個盧布，此外還有各種獎金和額外津貼。在這三年中我已得過十二次獎金，從五十個盧布到一百五十個盧布。我的長子每月可賺二百七十個盧布。

至於在政治上的艱難，情形是年年改良着。現在，一九三五年，生活比過去容易得多了。我們看見美好的前途在我們的前面。我的兒子們特別覺得如此。只要更努力地工作，我們便可以年年地堅實地進步。

但是主要的一點是在這裏：在美國我過着一種狹隘無聊的生活。而在這裏我知道爲什麼要生活和工作。我了解我是正在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

在這工廠裏我很快地習慣了這一切。工人們對我的態度很好，如同志一般。經理對我也是一樣。最初，的確，我覺得有點不方便，因爲不懂語言。現在我已

能夠說上點俄語了。

一個工人在這裏的進步是很快的。今天他還是一個不熟練的工人，在六個月之內就已學到一門技藝，再過六個月他就是一個突擊隊員，再後來就是一個工頭了。

我很用功地教育自己。研究聯共黨史和政治經濟，並且填寫了一張申請書，要求作一個蘇聯共產黨的候補黨員。

我很少到戲院裏去。也不常看小說，這是因為沒有時間。爲了工作，各種會議，討論，學習，我很少閑暇的時候。我也參加社會工作——是本廠工人管理委員會的一員，工廠重建委員會的一員，還管理一個初級技術班。

今年上半年我預計要提出二十五件合理化的建議，有十九件我已呈請審查。另外六件我已描摹在樣稿上。我有八個建議，已被接受而且實行了，因為這些我得到了幾百個盧布的獎金。我的許多合理化的設施使勞動生產力增加了三倍。

蘇聯已成了我真正的家庭。不僅是我的，也是我的兒子們的。他們也都在學

習和忙於社會工作。我們知道蘇聯是和平勞動的國家，是勞動者真正的祖國，保衛它和鞏固它是每個無產者的責任。所有我們的精神，所有我們的知識，我們都要貢獻給我們新的祖國。

莫斯科：蘇聯獨立黨，莫斯科，新大俄羅斯工廠，蘇聯總工會

成了蘇維埃代表

一九〇〇年我出生在維也納。當我十四歲的時候，就在著名的「高支工廠」做工。十八歲從光學專門學校畢業。但是當我在「高支」工作的時候，我同時還做革命工作，這當然是資本家們所不贊成的。一九二三年我發覺在這裏是找不到職業了，於是就到匈牙利去，但是在那裏也只能停留四個月。因為那兒發生了一次罷工，我，自然是其中一個活動分子，於是得到了通知：「布塞克君，你是一個優秀工人，但是除了對光學以外，你對於旁的事情也很感興趣，所以我們只得辭退你。」我又回到奧國，失業達十一個月之久，其後我充當了一名報版。

一九二五年我到法國，在巴黎「愛德華格洛騰鏡公司」工作，一直弄到一九三二年四月。一個外國人在法國生活比在匈牙利和德國要容易一點，但是結局還

是一樣：——

一九二五年，我曾參加一個合法的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參加的大約有八百人。我並沒有發言祇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聽着。但第二天我就被警察局召喚了去：「外國人是沒有必要去參加集會的。假若再看見你在那裏時，你就必於二十四小時內被逐出境。」

另外還有一個奧國人卽使在同一個公司裏工作。他已經在那裏十六年了。他比大多數人更加幹練，但是他的薪金始終祇有八百個法郎——一個生丁也沒有。老闆曾答應把他升做工頭，然而老是一句空話，老闆是不願意使外國人做工頭的。

我們外國人被資本家們看待得像下賤流民一樣。一旦恐慌襲來的時候，政府就決定把我們趕走。居住執照費突然高漲，而領取它也更困難得多了。要想在法國再住半年，你必須暗中賄賂警官，奉送五六百個法郎（實際上等於一個月的薪金）。

巴黎的「巴斯底爾」廣場是寬廣，清潔而且美麗的。在它的右邊卻是狹窄的小街縱橫交錯，它們是黑暗，污穢，而且氣悶，發着霉濕，腐爛，和髒布的臭味。這就是「外人區」，住着貧苦的猶太人，波斯人，和意大利人。他們最先受到危機的打擊。有許多人已經失掉了家。他們日間在市場中游蕩着，搜尋着廢物堆和罐頭中的棄肉。夜晚就在地道中睡覺。

在法國的外國工人就是如此地生活着。我必須着重說「工人」這兩個字。有錢的外國人不消說是受着不同的待遇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到了蘇聯，我馬上在城市的中心區得到一間裝置很精美的房子和浴室。我的行李也都帶來了。

第二天我就開始在「國立眼鏡機器廠」的光學部工作。

當時，蘇維埃眼鏡工業剛才開始踏上勝利的行程，熟練的工人很少，我管理的這隊包括有八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一月只能出產二十副粗糙的透鏡，多數需要再加磨工。這是在八月。到了九月我們已經能出產一百二十副了，並且所有

透鏡的質已達到了標準。現在做這點工作已祇需要四個人。工作十個月以後，我做了工頭，管理四十個工人。

依照在維也納和蘇聯商業代表團簽訂的契約，我每月的薪金是一百五十盧布。因為是突擊隊的領袖，我的收入超過了七百盧布，包括額外工作在內。現在我固定的薪金是六百五十盧布。一九三四年五一勞動節我得到一個月薪水的獎金。我們工會的中央委員會還送了我一件禮物：一個小圖書館，包括五十六本政治與小說的書。同年十月革命紀念日我得到了一個二十五基羅格蘭姆重的大籃子，裏面有一隻鵝，牛油，乳酪，肉，蘋果等等。

但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日子卻是十二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當蘇維埃舉行選舉的時候。當我住在匈牙利時我沒有選舉權，在法國住了七年也從沒有參加選舉過。但是在蘇聯，我，一個外國人，卻有權利選舉政府。僅祇這一件就使我覺得高興了。然而不止此也，他們還告訴我，蘇維埃的候選人就是——我自己。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幾天我興奮得像一個小學生一樣。

我坐在主席台傾聽着報告。當我參加辯論發言時，我告訴他們一個外國工人在蘇聯如何地覺得安適。因為這就是他的國家。我是用俄語講的，說得很壞——但是他們完全懂得。因為在這廳中的人都是無產者，是我同階級的兄弟。結果他們一致選舉我做維堡區蘇維埃代表。

我已經開始我的工作。我很喜歡我這新的職務。因為我看出這工作是嚴密地組織起來的，蘇維埃確係這個大區域中的主人。依照維堡區蘇維埃的命令，我們審核本工廠薪金的籌算並考查貨物被損壞的原因。以後我奉命組織一個「紅角」（俱樂部）和育兒所。現在我被指派視察美契尼可夫醫院第三十三號病室建築的進程。廠中的工人很了解我。他們往往把他們的控訴和建議送交給我——這個人，雖然是一個外國人，而且仍舊是一個奧國公民，卻是我們地方蘇維埃的一員啦。

奧國：布塞克——列甫格勒「國立眼鏡機器工廠」工頭

言論自由

蘇聯工人對於他們的主管人無論有什麼意見均可直言不諱。假如他看到在工作中有任何錯誤，他可以在壁報上發表，在會議上指出，要求改正。

在奧國我們和我們的丈夫們工作的廠中，就沒有像這類的事。任何工人他如果敢於批評他們的工頭，一定就要被開除。任何工人，他如果不參加法西斯工會也要被開除，任何工人如果當經理在那裏說話時敢於發笑，也要被開除。

在「喜頓柏格軍火工廠」，當經理要求工人保衛法西斯時，有兩個工人笑了，結果一週內他們就被趕出了工廠。至今他們還沒有找到工作——這是我確實知道的。

在蘇聯就大不同了，最近在我們聯合工場中偶然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情：

許多女工們在她們的壁報上對他們的主管人柯根出了一個攻擊專刊。他們畫

一幅諷刺畫，在我們工場裏輸送帶上佈滿了蜘蛛網，污穢和老鼠，同時大胆地標出柯根的名字，說他應該負這一切糟糕情形的責任。

假如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外國，那麼這些批評者早就被趕出工廠了。但是在蘇聯這件事却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柯根改正了他的錯誤。現在我們場中已是很清潔而整齊了。

在蘇聯男女工人們都是他們工廠裏的主人。所以他們獲得了自我批評的權利。

奧國：恩希利克——高爾基「莫洛托夫汽車工廠」聯合工場女工

同樣發明，兩樣結果

在維也納我在專製電氣測量器具的「諾馬工廠」工作了五年。這工廠，在奧國要算是同類工廠中最大的一家。可是只能僱用一百個工人。我的本意是要從事研究工作，脫去小工廠狹隘的拘束。於是我在一九三一年離開「諾馬」到蘇聯。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在一個極大的電氣用具工廠做工，這個工廠可容五千工人。我在廠中科學研究實驗室工作了三年半，參加電力機械組。

自然，我是因此很快樂的。但是，同志們，我必須向你們解釋：我之所以快樂並不祇是因爲在這樣大的規模裏工作；也不祇是因爲我終於能夠得到研究的機會，而是有另外的事使我快樂。

一九三〇年當我們仍在奧國的時候，我發明了一種裝置，能使平面螺旋圖轉動得更快。我是盡了自己的職責——因爲公司花錢請我來就是爲了這個目的。從

技術上說，對於這個發明我是很歡喜的。但是這樣來就多出一個工人，於是這個工人被解僱了。當時正是經濟恐慌襲來的時候，所以她迄未找到職業。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了她，她不勝憤恨地注視着我。

我知道應受責備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我，我不過是一個發明者而已。但是對自己的發明的滿意情緒終於消失了，而被不安和煩惱填滿着。我開始對我的發明嫌棄起來。

我到蘇聯以後，看見平面螺旋圈是用手統着。我想我的發明現在可以利用了，同時深信在這裏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的結果。我把圖樣送給了廠方。現在它已經被採用了。這門工作因此減少了三分之二的人力。我得到一千五百個盧布的獎金。自然我很歡喜，我的發明使每個人都得到了益處。工廠方面解除了一種困難。而被裁去的工人則已找到另外的工作，比原來的工作，只會更好而不會更壞。

這就是一個發明在兩個不同制度下採用的結果。以一個技術家的眼光來看，我當然知道在兩種情形下始終只是一個發明；但是以一個無產者的眼光來看，我

深深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發明，因為他們得出來的結果是不同的。

同志們，現在你們大概可以明白真正使我快樂的是什麼原因了。

奧國：弗蘭克爾——列寧格勒「電氣用具工廠」工程師

尋 業 難

最近「亞索夫鋼廠」工程師和技士部的主任狄姆希茲同志請求我答覆一個問題表。要答覆這中間的一個問題，我必須把這一年多的工作情形敘述一番。我自謀生活已經有了十一年，但是我只能說出兩個地方的名字，在那裏我已做了四年半的工作：西伯利亞的庫茲涅茨克斯特洛瓦和烏克蘭的「亞索夫鋼廠」。在其餘的地方我都沒有能夠停留好久。

有七年之久，我漫遊各國，始終沒有找到一種穩定的工作。我度過二千五百天的痛苦日子，僅能勉強餬口，腦中只是想着一件事——找工作。

一九二四年我在奧國林茲一個工藝學校畢業，得到一個金屬銲接技士的資格，我袋中裝着一張優良成績的證書，心中懷着燦爛的希望。但是當時奧國工廠正在縮減產額。我在「巴莫格布特勒工廠」還祇做了幾天工作，就意外地發覺自己

是失業了。

當時我是年青而且精力飽滿。我立刻動身到德國去。我走遍了全國，從紐倫堡到基爾，從布萊斯勞到都塞道夫，但是到處只見閉了門的工廠，門外站着絕望而飢餓的羣衆。

我從德國到瑞士。在這裏我在「貝利哥甫來勒斯鑄鐵廠」得到一項工作。但是在瑞士有一個這樣的法律，雖然沒有寫成條文，却執行得很堅決：在冬季除了旅行者和參觀者之外，所有外人都須出境。這法律是非遵守不可的。

回到奧國去是無用的，因為在那裏沒有找到工作的希望。我必須再到別處國家去碰一碰運氣。我跑到法國領事館去，他們問我：「你有足夠的錢住在法國嗎？」「我可以工作……」「我們國內已經充滿了失業者。但是假如你自己有存款的話，你必須把銀行存摺送來審查一下，如果我們認為適合時，那麼我們就可以發一張護照給你。」

我的朋友們幫我湊攏了六百法郎，我把它存到銀行裏，於是得到了一張護照

。自然第二天我就從銀行裏把這筆錢領出來歸還了原主。而我的目的却已達到了。於是我就動身到法國去。

一個月內我就已發覺無論是在巴黎或是里昂都沒有工作。在哈佛港和馬賽港我簡直連買一片麵包和住宿一夜的錢都賺不到手。

這時已是一九三〇年初，我的護照已滿期了。在非洲的法國殖民地發生了叛亂，當時法國軍隊在招募外國人入伍去鎮壓土人。像我這類護照已失效的外國人，只是簡單地被拉進了「客籍軍」——那決不是一個值得羨慕的前途。

我商通了一個載客輪船上的水手，要他把我隱藏在船尾上。我躲在那裏，三十六小時沒有飲食。這船是開往非洲亞爾及爾去的。在那裏我找到一個修理員的職務。他們應允每週給我四十五個法郎，但是在第三天，碰巧就是發薪日期，他們對我說：「我們付你二十個法郎，沒有四十五個。如果你要反對，那麼我們就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你的護照怕不見得有效吧，是不是？」

可是我終於設法離開了那個工作。在北非洲游蕩了八個月，沒有一個住的地

方，也沒有希望。從撒哈拉沙漠吹來的熱風，一連數星期割個不息。砂子磨擦着牙齒，鑽刺着肺臟。我找到了工作，在奎德富打（銀河）鑛場。一等工程完畢，我就回到奧國去——雖然在那裏我還沒有什麼希望的。

但是這次我的運氣來了。在維也納我遇見一些朋友，他們帶我到蘇聯領事館去，那裏有「蘇聯銜接工業托拉司」的一個代表，在招請技術專家到蘇聯去工作。這樣便結束了我的游蕩生涯，開始了重要、嚴肅、緊張的工作。我的能力很受賞識，我被視為一個良好的專家，因為工作優良我得過幾次獎金。

我走遍了十三個國家，但是只有在這裏，在蘇聯，我才發現了應用我的學識的機會。

奧國流亡者稱「山德尼爾」為留波爾「監獄」的監獄長，他於此處。

偉大的同情

自從弗洛立司道夫港戰（註）以來，還只過去不過一年多的光陰，雖是短促的瞬間，然而是何等豐富啊！在捷克，因不安而憂鬱着的亡命生涯；蘇聯方面來的聘請去在邊境上受到的熱烈歡迎；我們自己的無產階級祖國；在高加索的優美的甘孫；列寧的城市；工作並非不為老闆而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工作；以及已經變得如此近在身邊；如此真實明確的社會主義……

志，但是當我想起在這段期間最受感動的事時，我必須說那就是我的小孩們所受到的待遇。

我有兩個小孩——九歲的萬達和七歲的愛力希。當革命在維也納失敗以後，大家就已經在說着我們會要到蘇聯去。我的小孩的眾朋友們中，年紀雖小然自己經心滿意足的小紳士們，對他們說道：『你們這些可憐的孩子！你們會被送到俄

國的學校裏去，那裏真是餓極了——那些窮孩子們對着地板上吐痰。」

現在我們的孩子們已在列寧格勒。列寧格勒的蘇維埃照管他們。他們本可以去進一所專爲日耳曼人而設立的學校。但是在沒有進日耳曼學校以前，我的孩子們要求到這個俄國學校去參觀一下。

「我到底不相信他們會吐痰在地上，」滿達說。

我的妻帶他們去參觀了一個俄國學校，他們回來時滿腔興奮。

「那裏是如何地光亮、清潔，真是清潔啊！」他們兩人一塊兒嚷着。並且那裏有一個如此壯麗的健身房。讓我們到俄國學校去吧！爸爸。」

「很好，你們會要在蘇聯長住下去，所以應當學習俄語，」我說：「你們願意進俄國學校，我是高興的。」

於是他們進了俄國學校的初級班。他們還不十分懂得俄語。你也許會以爲他們在那裏處處感到不便，成績低劣，在班中孤零零的無人理會。但事實上恰好相反。一個奧國革命者的小孩在這裏受到最大的注意和溫柔的照料。每天他們總勝

「一些新的禮物回家——只是一些小東西，橡皮，鋼筆，鉛筆，練習本，各種顏色紙和彩色的布屑——都是孩子們所最喜歡的小東西。雖然是一些小東西，但是它們每次都使我感動得眼中含淚。」

「愛力希，你從那裏得到了這些東西？」

「這是俄國的男孩們和女孩們給我的。」

「這真這種餽贈簡直變成了一種制度。這一班人顯然在舉行着普遍的競賽。我告訴孩子們不要受任何禮物。但是他們說，『假若我們不受他們就發氣。他們把禮物塞到我們手中就跑走了！』」

在初級班的學生都是八歲的小孩。送禮是這些小孩對一個奧國革命者的小孩表示同情的方法。

連小小的孩子們也表現了這樣動人的國際主義的精神，可見國際無產階級的連帶關係的確是非常有力的。

「先生待我們就像她是我們的媽媽。」萬達告訴我。「我們這一班有四十個

同學，但是她時常跑到我們的身邊來？在我們的抄本上把所有的俄文都用羅文字母注音，所以我們就懂得了。」

這個先生到我家來訪問過一次，她來看看自己的外國學生是怎樣生活着。我不相信在任何別的國家兩個被趕出祖國的孩子能夠受到如此的愛護。

啊！是的，我還忘記指出萬達和愛力希那個學校的名字，它是華爾里烏歐的第四十學校。他們的先生名叫貝科科瓦，但這不是重要的。我在蘇聯雖沒有好久，但是我深信我的孩子無論在蘇聯的那個學校都會受到同樣的歡迎。

奧國：柯齊亞——列甫格勒毛皮工廠工人

（註）這是指一九三四年二月奧國工人在維也納的武裝暴動，工人們殺

逃脫了羅網

我在維也納「西門子——哈斯克工廠」做旋盤工直做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工作時間很長，每天十或十一个小时。但是工資却少得可憐。我的收入僅能養活我和我的妻。

我們感到使收支相抵太不容易，於是我的妻到辦公室找得一項工作，她每天花費十一小時在那裏清理賬單，賺得些微的薪金。然而不久她就被革了。

在奧國工人們那次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暴動中，我是一個分隊的指揮者。那次英勇的暴動終於失敗了。它被空前的殘酷手段鎮壓了下去。有些工人被法西斯槍斃了，其餘的則被關進了牢獄。我與一些同志幸而逃脫了，我們躲避着那些法西斯兇手，向捷克斯拉夫邊境逃竄。

法西斯把我所有的朋友和戚族捕下了牢獄。他們被拷問，被脅迫；如果我不

回去，他們就要永遠關在獄中。我的書記還專通知了我，同時懇求我不要回去，即使她要在獄中坐十年也不要緊。

我八次行近了捷克邊境，八次被迫退轉來，因為到處有法西斯哨兵在防守着。只有在第九次我才設法越過了邊界。

一到莫斯科之後，我就在無線電廣播臺演說。當法西斯聽到它的時候，他們知道他們的計策是失敗了，我已經脫離他們的羅網，不會回來了。他們這才發現了我的家族。但是我妻已經無家可歸，因為我的住宅已被那些「文明的」法西斯黨徒劫掠一空而且搗毀了。

現在我是在莫斯科「發電機工廠」操舊業——當旋盤工人。在蘇聯首次出產的一部分最複雜的機器，是從我手經過的。

在工作中我受得每一個人的殷勤待遇。我不僅在工人們中，而且在下層頭自，工程師們和工頭們中，得到同志般的扶助。我們的工廠就像一個大家庭。唯一使我們煩惱的事情就是工具不夠。

在進餐的時間，我們奏手風琴，跳舞，大家快活一陣。

我從來沒有覺得時間過得像在蘇聯這樣的快。日子在不知不覺間就溜過去了。也許這是因為我事情繁忙之故。我在學習俄語，進大學夜班，我在「外國工人俱樂部」奧國組和本廠「國際紅色救濟會」工作。我常為「馬達」（本廠報紙）和 Rabochaya Moskva 撰稿。

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必須利用每一點空閒時間來研究政治著作。我讀馬克斯，列寧和斯夫林的著作。

工廠對工人們的福利是十分注重的。我的住宅很精美。我自己有一個大房間。我的收入足以使我舒服地生活。

我妻如此喜歡在蘇聯的生活，所以絕對不願想起再回奧國去。

「我從沒有這樣幸福過，」她常常對我如此說。

她已經成了一個康敏主義者。

蘇聯是我們所愛的新的祖國。當我們在此的時候，我們已經深知蘇聯的目的。

在保持和平。紅軍並不需要別國的土地，但它時時準備着保衛蘇聯的疆土，抵禦敵人的侵略。

美國：斯特恩——莫斯科「基洛夫發電機工廠」旋盤工人

求知慾

我不屬於任何政黨。我的社會活動僅限於在「比利時工程師技師協會」中的積極工作。我的頭髮已經斑白了。我已有六十三歲。但是，當說到蘇聯的時候，我不能不有偏向，因為我對能幹的俄國人民了解得太清楚了。當說到革命後的俄國時，要想保持中立態度是很難的！

法國歷史家米希勒（Jules Michelet）說過：「俄國是一個揮舞着專制之鞭的荒蕪之國。」這是真的。我在俄國住過二十年。一八九六年我在這兒，世界大戰期和內戰期間我也在這兒。一九三三年我又來到了俄國，當時這個曾經是荒蕪而且被壓制的國家正在空前地發展着。

第一次到俄國的時候，我，比利時的一個農家子弟，非常駭異地看見這個國家是在沙皇騎兵的淫威之下。所有的知識分子，所有最優秀的人民，無不遭受摧

殘。後來，當我看見戰後比利時工業的重建是多年靠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時，我便認清了在我們那個國家與在俄國也是同樣的情形，只是做得更加詭秘罷了。

我第二次來俄國時是在第一次歐戰期內，我目覩沙皇統治的崩潰。我間接地參加了內戰的工作。在那些年間我是亞爾契夫斯克（註）冶金工廠機器工場主任。我修理被炮彈打壞了的裝甲車。因此我被白色特務工作隊秘密逮捕起來，僅靠我的外僱身分才得免於槍斃。第二次紅軍撤退的時候，我跟他們一道走了。

以後我就回到比利時家裏。那時我的孩子們正在修完他們的學業。我在安特衛普協助一個非鐵金屬工廠的設計和建築，直到一九三一年。等到工廠一開始工作，我和另外一些建築工程師就被解僱了。在蘇聯，有一個發展工業的遠大計劃，那兒的建設沒有無政府狀態，沒有失業。但是在我本國我却有兩年找不到工作。我僅靠每月領一點點救濟費勉強維持生活，我把我的科學工作在「工聯」（F. Alliance Industrielle）雜誌上發表了。一九三三年，當我的孩子們已能自食其力的時候，我就和我的妻子重往蘇聯。

蘇聯的確不愧稱為各國被壓迫者的家園和避難所。對於我，它也成了一個第二故鄉。在這兒我由得國家照料。假如病了的話，有好的醫生來診視我。每年我有廿次假期，薪水照發。這在他國是做不到的。

在這兒我覺得真是十分安適。這不是一句空話，乃是我所想到所感覺的具體表現。在這樣說的時候，我只是重複着我在「比利時工程師技師協會」演講所說的話。

我完全滿意我在蘇聯所做的工作。我在頓巴斯「伏羅希洛夫工廠」領導一隊建築工隊。這是一種重大的責任感的工作。我所處的地位與在波特爾普時相等。雖然波特爾普完成工作而波特爾普方面因情緒未不相調的。但總之，這點所似並無在此重述的必要。雖在波特爾普是管理員的時常更調。在過去兩年之內，經理部曾換過六次人員，這對於工作發生了不少的妨害，但是在整體上，我們的巨大而且繁雜的任務是以遠見和理知來進行的。

我在蘇聯極少親密的朋友。我不常與人往來。也許這是因為我並非一個長於

社交的人。也許同時因為我是在盡其可能地利用每一分時光。在閑暇時候我讀蘇聯和比利時的報紙。我喜歡瀏覽那沒有政黨關係的『晚報』，當作一種消遣，在那報上差不多有比利時一切政黨的領袖們開着無盡的有趣的筆戰。我讀蘇聯和法國的書籍。我學習俄語。我增進着關於藝術、古代史和音樂的知識。對蘇聯的藝術我實在非常欽佩。一九三二年我還在比利時的時候，就已看過有聲影片『生路』。這個片子在那兒激起了一陣狂熱。它表現給歐洲看，蘇聯的現實主義藝術正是飛躍地前進着。我曾在『工程師技師協會』的演說中講到這個影片，我說：『在歐洲，在我們這邊，危機和失業使正直的人變成了盜賊流氓。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所做的恰好與此相反。』

我在家時，工作得很多。我的環境是十分優美的，自己有一所住宅。除一些不關緊要的不方便之外，我對食物也無間言。上司們對我的態度頗足以激勵良好的工作。

我年紀已不青了。還有許多事要做。一個法國的工程師兼詩人，奧斯蒙德

(Florice Osmonde)，在他的『自白』(Confessions)中說過：『無論你對正在建築中的巨廈所貢獻的勞力是何等微小，你的生命總不會白白過去而不留下它的痕跡。』所以我工作。在列日(比利時的一個城市)我曾發表兩本工藝著作，十八篇科學論文，目前我正在為那些要從事於金屬構造的工程師和技師們做一種工作。所以就我自己說，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生煩惱。但是我的妻——她却煩惱了。她不懂俄語，她甚至不能與鄰舍們做朋友，所以常常思鄉。

我想還講一講我目前正在著作的與我其他工作同性質的這本非常有趣的書。我已在前段說過，它是為工程師們而著的。請容我說我平日所喜歡的作家之一是米來波(Octave Mirbeau)，我愛的是他那爽直而且尖刻的風格，因此，在此際如果我的筆對某些人似乎缺少了恕道的話，我希望能得到原諒。

在荷蘭和比利時我曾在某些專家們中間看出一種可驚的偏狹。在某些蘇聯工程師們和技師們中我也發現了同樣的缺點。如果他們的專長是冶金學，那麼就只有冶金學；如果是化學，那麼就只有化學。他們再沒有別的用處。這是由於這些

人不好學的緣故。一個人得到了他的文憑，於是以為他的教育就算終了。但是其實大謬不然！一個得到了文憑的工程師是一個貼着漂亮籤條的瓶子——裏面隨便可以裝什麼東西。我爲了精通製繪圖樣已經研究了四十二年。我研究古代史，埃及和羅馬的建築，繪畫，音樂，詩歌，哲學——凡我們所稱爲文化的一切東西。一個人如果不懂得羅馬人在他們的偉大時代是怎樣建築那就不能做一個良好的建設工程師。請相信我，羅馬人在那時候的確是善於建築的！在比利時通格爾城附近我會看見比利時屬於羅馬帝國的時代羅馬人所建築的一條公路和橋樑。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工程，直到今日還在供人使用。

一個工程師在得到文憑以後，應該比在學校的時候研究得更加淵博。每一個人必須記住這一點：有知識的意義就是工作得更好。

在這拚命從事於偉大的建設工作的莊嚴燦爛之國在這表現了人類歷史所未嘗見過飛速發展的和平勞動之國，人民應當在文化方面比他們的西方鄰居們高出一等。和西方比起來，蘇聯實在貢獻着非常多的學習機會。每一個工人可以不受一

點限制從世界智慧的泉源盡量汲取他的知識。這些機會必須充分地利用。

目前我正在完成着我這本著作，企圖盡我的全力以使它具有這樣的價值：它不但將在一個工程師的內心喚醒一種知識的飢渴，而且將指引他，誘導他，爲他在研究中——在這艱辛然而愉快的旅程中，植立路碑。我想把這著作在蘇聯出版。它將能幫助許多的技術人才。

我覺得我在蘇聯社會是平等的一員，而且在已到蘇聯來的許多國籍的人們中間我並不是例外。我覺得蘇聯人民在力求和平，這並不是由於他們的懦弱或別有圖謀，而只是爲求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這就使得我不能不盡我的職責。我敬仰蘇聯所追求着的偉大目標；在這神奇的巨廈——全世界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的牆壁中，只要我手所置的石頭能佔得它的地位，即使這石頭是非常地渺小，我也就十分愉快了。

我已經老了，但是在這裏我仍覺得年輕。我很抱歉不安，我與工廠所訂的合約將使我暫時離開蘇聯。在比利時，夏爾洛瓦的煤礦，「冶金卡德爾」，淮維爾

的，安特衛普的和根特的各工廠，弗朗德的和布拉邦的農業區，都是緊緊地迭在經濟危機的鐵腕之中，一個工程師在那兒決不能像在蘇聯這樣自由工作，一無掛礙。

我深信在全世界許多國家的誠實人民都會與我說同樣的話。

比利時·慕格——頓巴斯，伏羅希洛夫斯克。

「伏羅希洛夫冶金工廠」工程師

（註）亞爾契夫斯克即今伏羅希洛夫斯克之舊名。——原編者

一個學生的比較

一九三〇年，當我在捷克貝爾諾城「日耳曼工藝學院」做學生的時候，因為不能繳付房租的緣故被逐出了宿舍，以致不得不在葡萄園中睡了兩個月。聽起來也許是很浪漫而且動人的吧——「睡在葡萄園裏，」——但這不是在九月，當葡萄藤上垂滿着一簇簇熟葡萄的時候，而是在結冰的二月和三月。爲了避免凍僵，我把自己藏在糞堆中。牠能使我溫暖，他媽的！我因此還很感激牠呢。但是我仍舊還是睡得不好。當我在夜晚醒覺的時候，我回憶到過去的生活：齊諾塔利察那個小小的保加利亞村莊，在那兒我出生於一個貧農的家中；我的不能讀書寫字的母親；我的父親，他幾乎不能維持家用，但仍日夜工作以使他的五個孩子得受教育；富農支維特科，華西里也夫，我爲他工作了一個夏季，替他的打穀機燒煤；屯卻。卡匹塔諾夫，澤而可伐村的一個富農，我爲他做了一季的工，他卻沒有付給

我一個錢；赫諾夫地方的一個工人，是他第一次告訴我關於共產主義的事。

一幕又一幕，過去生活的圖畫湧現在我的面前。加布諾夫的工藝學院：

「都爾乞夫，站起來。你為什麼不穿上制服？」

「莊乞夫先生，我沒有錢做制服。」

「你既然沒有錢，為什麼還要到這裏來求學呢？最好還是到礦山去做工吧，

那才是適合你的地方。」

恐怖的一九二五年。宇非亞（註）教堂被焚燬。頃刻之間，似乎在一個預定的信號之下，白色恐怖降臨到保加利亞的每一個城市和村莊。在加布諾夫，人家曉得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於是被學院開除，這還不過是我受迫害的開始；接着是兩次被逮捕，一頓幾乎斷送生命的毒打，水龍衝射，然後……偶然的得救。

始終新鮮的記憶在我的腦中湧動……轟擊使我溫暖，而我因此很感激它。但是胡思亂想使我不能成眠。

估量着我的地位，計劃着我的前途，我自言自語道：「捷克本身已充滿了失

業者，因此聰明的政府禁止把工作給外國移民做。尼河拉！你已經找了很久的工作，但沒有找到你可以賺到一個錢的地方。而想要生活和學習，你就非有錢不可。你想要到蘇聯去當一個熟練的工程師，但是當你到達那兒時，似乎還得先做一個普通的工人，獲得你的知識。

於是我就離開我那舊堆中的宿舍來到布拉格，去找蘇聯商業代表團。我對於引擎頗有學識，於是在一九三〇年十月我被送到蘇聯去當江工人在列寧格勒我被雇用在「俄羅斯第塞爾廠」裏面，不久以後，隨本隊的請求，被分配到機械部現已改為「江工」學院去學習。去年十一月我通過了最後的考試，目前正在完成我的計劃。再過一些日子我就會成爲一個工程師。準備與海納蘇維埃工程師。在此，我亦禁要把一個無產階級的學生在外國的和蘇聯的生活，兩相比較一下。我在貝爾諾曾受過些困苦，但是我仍要竭力保持公平的態度。

在那兒我是一個外國人，不能找到工作，而沒有工作，我便不能坐落，也不能有求學的權利。但是在這裏他們卻告訴我道：「既然你是個工人，你便有資

格學習，而且還有一筆現金津貼。於是，一個外國人，一個保加利亞人竟獲得了每月一百五十盧布的津貼。

在貝爾諾城，運氣好的時候，我有一個床睡，否則我就只睡在糞堆裏，好像一隻喪家狗。在蘇聯我住在三個學生宿舍——在濟利比奇維斯基街上的四層巨大的房屋，這是一九三二年所建築的。我們三個人合居一間房子。除臥室外，還有書房，餐室和「紅角」（俱樂部）。每層有六個淋浴的裝置。每間房裏還有無線電收音機。

在貝爾諾，每次練習要付二十個克龍，每次考試要付三十五個克龍——這都是每學期三百克龍以外的額外費用。因為我不能繳出三十五個克龍，所以我沒有得到關於機械製圖的證書。在那裏科學是按斤兩發賣的。一點點學識都要付錢才行。但是在蘇聯不僅學費免收，而且對於成績優良的學生還有獎金。因此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得以在列寧格勒附近的塞斯托諾萊斯克免費休假；後來又到克里米亞，進雅爾泰工會中央局的療養院。

在貝爾諾每個學生必須自己買書籍，和繪圖等用具。在這裏都是由學校供給。在貝爾諾學院的圖書館中沒有教科書，科學叢書也不能借出館外。但是這兒的工業研究院的圖書館，卻有充分的教科書，並且還允許學生們借到家中去閱讀。

在貝爾諾，一個落後的學生，只有出錢才能得到幫助，假若他能夠付錢的話，就是學習十年也沒有人阻撓他。在這裏對每個學生的進步是非常注意的。對落後學生的特別學費不僅免收，甚至認為是應盡的義務。

貝爾諾的人們對此一定會覺得驚奇；就是蘇聯的學生可以向教授提出問題，在講學的休息時間，可以走去和他談話，如一個同志般對待他。像上面這類的舉貝爾諾的學生是辦不到的，在那裏，只是拘泥儀式官樣文章。舉例來說：學生在大考的時候必須穿上一套黑色衣服。要是他穿了別種顏色的衣服，便會被禁止入場。

最後——談談學生們的本身吧。關於社會的差別那是不必說了。每個人都明白這點。在貝爾諾，最得同情崇拜的學生，便是面孔上受刀傷最多的學生。只要

在一場決鬥中稍爲被刮傷了一下，他便綳帶滿身，高視闊步，儼像一個英雄。在蘇聯，一個學生的主要榮耀卻是學習得好，而且善作社會工作。蘇聯的學院是充滿着生氣勃勃的無產階級的生活——壁報，政治討論會，「文化運動」，晚會。或者把我們自己這一羣拿來看一看吧。我們之中有十一個是黨和蘇維埃的負責工作者，被送到這裏來學習是爲了要造成「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新軍。我們這一羣包含三個有二十年以上工作歷史的工人，四個有十七年歷史的工人。當我們開始學習時，我們共有二十五個，現在正在卒業的有二十二個，在五年中只退出了三個。而且我們中間只有兩個未婚的，其餘的都已結了婚。

在這幾年的學習中，我已和蘇聯工人階級的這些光輝的代表們聯繫得非常密切。我已從他們那裏知道革命是如何完成的。我在那裏已學會了很多。我在保加利亞曾經參加過革命運動，但是在這裏，在這學院裏，我才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當我學習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時，當我在社會工作的進行中發展着時——因爲，雖然我不過是地方蘇維埃財政組一個志願工作者；但那

究竟是無產階級獨裁制度下的一部分。

不久以後我將呈繳我的的學位圖樣，然後離開這裏到尼齊尼塔基爾去，在那巨大的「烏拉爾機器工廠」裏開始工作。我——過去的一個苦掙的學生，今日的一個蘇維埃工程師，——的眼前將展開無限的前程。

保加利亞：尼可拉·都爾乞夫——列甫格勒「工業學院」學生

(註)保加利亞首都。——譯者

我過得很好

我生長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個村落裏，十四歲的時候，我離開初級小學，到滬寧鐵路的車箱修理所和車頭鑄冶場當學徒。我必須毫無代價地工作六年。我憑著至靈至聖的菩薩之名跪地發誓：要服從我的師傅，要溫順馴良。但是我的師傅是一個兇暴而愚蠢的人。他不耐煩教授我的技藝，而祇把我當作他家裏的一個僕人。因此我就不願誓言，脫離了這車箱修理所，決定到蘇聯去。

我在蘇聯已經四年了，其中有兩年我在「烏拉爾機器工廠」做工。我掌管着一部複合輪磨機，我對它十二分地熟練。我是一個突擊隊員，爲了工作良好曾得過幾次獎金。我與同道工作的人們相處甚歡，且有許多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俄語說得相當流利，但是我還不能完全懂得它。我覺得俄文文法極難，有些人說中文很難學，但是我爲沒有比俄文文法更難的東西了。我有許多俄文

教科書和一部字典。如果我發現有一個字不懂，我便問我們工場裏的工程師。

我有一個先生，他常到我的屋裏來教算學和物理；今年我準備進機器研究院的夜班，想學做一個工程師。

我過得很好，每月有三百個盧布的薪金，還有自己的一個房子，我在公共食堂吃飯，那裏的食物十分精美。

每逢假日，我就到戲院或電影院，對於俄國的文學我不十分懂得，但我是俄文報紙的經常讀者——『真理報』和本地的報紙。我還讀在蘇聯出版的中文報紙和雜誌。我是本工場『國際紅色救濟會報』的編輯，那是用俄文出版的。

至於你問我怎樣消遣假期。去年我是在克里米亞的西美茲。今年我的例假是在二月，仍舊在克里米亞——不過這次是在阿魯卜卡。

我的身體健康，並且自信有光明的前途——它與蘇聯的繁榮是互相結合，不可分開的。

工作與學習

二十歲的時候我來到蘇聯。當我離開在京城附近的我那故鄉的時候我覺得很難過。但是我必須幫助家庭，我必須自謀生活，而在故鄉或那些島上要找到工作是完全沒有希望的；我的幾百個老同學都在閒蕩者沒有事幹……。突然有一個消息傳到我們朝鮮：有一個國家，那裏有許多的工作做而且還有很多的學習機會。

這正是我所想去的的地方，於是我就到蘇聯來了。

七年前我剛到蘇聯的時候，我不會什麼手藝。在蘇聯我變成了一個熟練的機械匠。現在我在『烏拉爾機器廠』第一機械場做一個裝配突擊隊隊長。我担任很繁重的工作。

我很感謝廠裏的同志和工頭們。他們細心體貼我，時常幫助我，向我解釋我

所不懂的事情。而現在我自己可以幫助別人，爲別人解釋事情了。因爲我是十個突擊隊員的領袖。現在我已懂得如何看一個樣張。工人們都懂得我的指示。但我還不十分懂得俄語的緣故，仍不免有些隔閡。我看俄文報，學習文法。我有一本完備的俄日字典，並且花費了很多時間去學習。我對於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特別有興趣，但我覺得讀俄文很難，而關於這類東西的鮮文書籍是簡直找不到的。我開始讀『前衛』（在伯力出版的朝鮮報），但是我覺得不易懂得，因爲這比我在朝鮮所說的語文不同。譯文也顯然很不佳。

你問我和身邊諸人的關係。說一句老實話，在這裏我有許多很好的同志，俱沒有真正的朋友。這大概是因爲我工作以後即刻回到家裏坐下來讀書和看樣張。我不常到別的地方去，雖然電影院的影片我幾乎沒有錯過一次機會。

朝鮮：李泰——史維得洛夫斯克「烏拉爾機器工廠」機器工場突擊隊長

科學與體面

我的父親是曼徹斯特某銀行的一個高級職員，他的收入足以使我受得『優美的教育』。我被送入一個闊人子弟的學校，以後進了劍橋大學。

以思想而論，我是既不急進，亦不反動。當學生時代我所做的一件最『革命』的事便是：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時期，我拒絕跟那些資產階級的大學同學去參加破壞罷工的活動。的確是沒有進行援助罷工的宣傳，也沒有痛罵那些破壞罷工的頭目。我只是簡單地拒絕去效法同學們的榜樣而已。

一九二七年，從劍橋大學畢業後，我在一個著名物理化學家的實驗室中工作了兩年，然後在一次公開競賽裏面獲得了一獎學金。憑藉著這個獎學金，我到了維也納，一個工藝學院工作了一年。

當此時期我始終在政治方面保持着中立的立場，以為這是一個科學家的正當

態度，因為科學家的職業性質使他必須，不過開「俗惡的階級鬥爭。」

一九三〇年我回到英國，在曼徹斯特「中央棉業研究院」找得了工作。因工作的關係，我到工廠及工人階級中去。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目擊了工人們的貧苦狀況，開始採取了他們的思想方法，用他們的眼光去看事看人了。

一九三一年我參加了三十個英國科學家的蘇聯遊歷。我們遊歷過列寧格勒，莫斯科，尼齊尼，諾夫哥洛得（今已改名高爾基），斯大林格勒，參觀過許多研究機關，如「約飛物理工藝學院」，「中央航空流體力學研究院」，「織物研究所」，「卡波夫化學研究所」等。我的同伴們和我開始明白英國輿論對於蘇聯所進行的事情是何等地失實。傳到英倫三島的一點點關於蘇聯的消息都是謠言。即使有些真實的報告，也有缺陷，因為它們是靜止的，只攝取某種一定事件，而忽卻了最生動的東西——猛烈前進的運動，這是蘇聯最特別的一點。

我對蘇聯科學的發達感到非常驚愕，而對蘇聯政府所給予科學家們的愛護更是深深地感動。我看見蘇聯青年們以可驚的熱忱進入科學生活而且以他們的勇敢

和堅決促進它的迅速發展。

然後我又回到英國，回到我的棉業研究院。這對照真是大尖銳了。我因遭腐敗的空氣而感得窒悶起來。我必須解釋一切。在英國，科學是握在那些可敬畏的人們之手。漂亮的形式和優美的禮貌比經驗豐富的才能更受器重。只要說出這一件事就足夠明瞭了：當事實的需要迫得英國科學家們不得不成立一個工會組織時，科學工作者聯合會這個名詞，因為與普通的工會相似，那些紳士先生的耳中覺得太難聽，以致即刻改成了更雅馴的科學家協會。這個無生氣的名稱使我那些有學問的同事們完全滿了意。

這時世界上正發生着悲慘的事情。在一九三一至三五年英國最有力量的工業——棉織工業——只有百分之二十還在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想及真正的技術改革也全無用處。一切合理化的辦法結果最壞的工廠倒閉，我們的研究院之所以仍得進行其無益的工作而未倒閉者，僅是因為某些工廠的老闆還繼續在從工人身上剝削他的收入中，抽出一點兒來維持着它。而他們之所以肯來維持，卻是

因為他們恐怕如果研究院倒閉了，那麼他們對那些競爭者企圖使自己逃脫危機的陰謀詭計便會無法曉得。

科學家們，尤其是青年科學家們，這時候處境真是十分困難。剛從大學畢業出來，即使他有才能，有成績，也不得不接受某種行政職務，或是去為戰爭工業從事於祕密的科學工作——那樣一來便如飛鳥入了牢籠。

我自己在英國的時候，物質生活總算還不壞。一九三二年，研究院把我升了一級，把我的年俸從三百五十鎊加到四百鎊。因此，當我宣稱我要到蘇聯去工作時，研究院主任認為那是極端忠厚負責的表現。真的，從普通英國科學家的立場看來，我的舉動未免是不可思議。因為，無論怎樣說，我拿着一筆很大的薪金，而且有把握可以過舒服的生活。

但是我最需要的是研究科學，而不在尸位素餐。於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我到了列甯格勒，在『化學物理學院』中工作，在研究員賽米諾夫的指導之下。現在已在此做了三年，研究游子在化學反應中的影響。在這裏我終於找到了我的職業

，我努力工作，我所得意的是獲得了學院中最優秀突擊員的資格。與我的熱心工作的同志們一道，我慶幸蘇聯科學的迅速發展，科學工作質量之顯著的提高以及它們論題的更加深入。與我的同志們一道，我參加以我們學院為中心的積極的社會生活。我們成立了一個滑翔隊，我常乘滑翔機飛行。我們組織滑雪旅行，我也是其中一個。我們開關了一些網球場，我常去打網球。我們在一個射擊俱樂部練習，我已學會用一枝來福槍直射。生活已是多方面的，充滿着新鮮而且有趣的事情。

我的妻和孩子們與我同住在列甯格勒。我甚以她們離英來此為幸。婦女們在這裏比在那邊有更好的生活。任何女人在這裏可以在任何時候找得工作。我的孩子們也已來到了一個良好的地方。我的兩歲女兒安妮在學院為科學家兒女所辦的托兒所中消磨着她的時光。四歲兒子米開爾在『列甯格勒科學家俱樂部』的幼稚園。一九三四年夏天我和我妻到高加索去遊山。我們全不需要為兒女操心。他們在台茨珂也。塞維一個優美的休養院度過了整個的夏季。

我想敘述一個插話，它足以表示兒童福利事業在蘇聯是組織得怎樣地完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某日，我妻帶着米開爾到托兒所去（那時他還沒有進幼稚園），但是他們不肯收留他，因為他有點發熱（他們每早晨在准許兒童進公共房間以前要為兒童檢驗體溫一次）。一個醫生立刻被打發到我們這裏來了。他發現這孩子是在患着白喉症，便當場注射了一次。然後他喚來一輛急救車，我的兒子便帶到一個優良的兒童病院去了。這病因為診治得早，所以迅速而且容易地離了身。又由於隔離得快，米開爾的妹妹安妮沒有受傳染。

我很高興，我的孩子們在蘇聯成長着，受着他們的教育。他們將會成為愉快活潑的人民，熱心工作，而不致再遭逢那曾經損害過我的不幸——他們不致受得一種隔離現實生活的狹隘枯燥的教育。真的，年少的英國人們是那樣地壓在資產階級級教育制度之下，赤色的真是極少，至多不過是帶點粉紅色罷了。而且到了二十五歲左右的時候，連這點粉紅色也要脫褪下來。體面——這是英國自稱為知識分子者所不能缺少的。而「體面」卻連一點粉紅色也不能容忍。

不久我將回英國去。我不是任何政黨的一員，但是我要利用一個英國公民的權利，在選舉會議上發言。我要訴說蘇聯的真情實況，希望藉此能對英國共產黨有所幫助。

英國：阿爾藤吞——「列甯格勒化學物理學院」研究員

一個女教師的經歷

一九三三年我到蘇聯來，是因為我對於這個在英國人家爭論的發生了興趣，有些文章將蘇聯寫成「一個充滿着牛奶和蜜糖的地方」，另外有些則描寫蘇聯是一個想像所能及的最可怕的地方。當時一位住在莫斯科的朋友寫信告訴我這些敘述均不確實，但是即他的說明也與英國的種種事物是如此不同，以致激動了我的好奇心，使我不能不離開自己的職務而親自跑去看看。在英國雖然有許多事情在政治方面使我感到苦悶，但當我離開時，我還沒有失業，因為教師的職業在當時差不多還是百分之百的可靠。

在英國我會受過師資的訓練以後就在一個工人子弟學校教書。因為我是從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這種訓練很使家裏花費了一筆錢；同時我也很困苦。有好幾年是半工半讀。我每天的工作是從上午九時到午後四時，學習的時間就只有早晨

六時到九時，午後五時到十時。我又沒有錢請人教授，所以學習完全靠自修，一個人貿然摸索着，而且往往因為走入錯誤的途徑，虛耗了許多時間。

當我離開英國的前兩年，我在倫敦近郊教書，那個地方曾被譽爲『近郊皇后區』，因爲那兒風景美麗，沒有窮困。它可以說是最不容易發生失業恐慌的一個地方，然而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中，那裏也有一羣羣的人守在工作介紹所，也有飢餓的小孩。我的工作是在最先受到資本主義鞭笞（失業）之苦的人們中間，當我看到因爲缺乏營養的緣故，小小的面龐一天天消瘦和稚弱的心靈一天天更遲鈍的時候，我是如何的痛苦啊！當地一羣教師和居民想設法使學校每日備辦晚餐。當代表團請求市長時，市長的答覆是：『在這區裏我們沒有碰到有貧窮的，所是礙難照准。』

對於英國的一切情形既已覺得非常煩悶，我便到俄國來。使我驚異的景運兒看不見失業，而街上走的行人們都充滿了愉快而有自信的喜色。我開始在莫斯科的英美學校教書，我非常快樂，我覺得這比在英國時所做的工作有趣得多。

我最初來到這裏的印象是多而複雜。有些印象，譬如擁擠的電車，使我覺得頗為不愉快，但當我在蘇聯的兩年中，卻從沒有發生過再回到英國去的念頭。在一九三四年幾個月的假期中，我回到英國，那時我想留在蘇聯的慾望甚至更加強了。

關於我在英國所教的小孩的情形已經說了一些，但是還沒有說到工作的實際情況。學校的校舍是被認為學校建築的模範，但我仍不得不在有五十二個小孩一班的教室裏上課，由於密接着一個看守人的屋子，我們簡直看不到一綫陽光。學校的秩序全靠恐嚇來維持，所以要常常應用教鞭。

拿這些來和蘇聯比較一下吧。許多的建築至今離我們的理想還遠。雖然如此，但是至少它們已建築得與別的房屋離開得足以使教室裏有充分的陽光。每班人數從沒有多到五十二人，若不是教師如此缺乏的話，他們將更減少每班的人數。在英國與蘇聯的學校最大的差別還是在學校中的氛圍。這裏沒有恐嚇；全體都是同志，教師不過是較大的，懂得更多一點的同志，他在這裏為的是幫助任何需要

幫助的人，同樣也願意在某些問題上向小孩們學習。在學校以外，他也願意和孩子們一樣地蹦蹦跳跳，像一個哥哥或姊姊。當學年結束時，這裏也和英國一樣舉行考試，但是在英國已成特徵的戰慄的恐懼和神經失常的現象都不見了。每個學生都知道教師不會故意捉弄他，而會盡力地發現他真正備得些什麼。在這樣的家園中教師怎能不愛他的工作？你還奇怪我甯願在蘇聯工作麼？

在英國一個工人階級父母的兒女，想要學得一門職業或是技藝，他必甯像我過去一樣——使他父母為耗費而貧窮，而且可能因過度的工作而損害自己的健康，在蘇聯是如何的不同啊！這兒他讀書是不要自己出錢的，並且全部學習和工作的時間也不過是普通一天工作的時間。

還有一件事我也要作出一個比較，就是兩個國家的人們消耗閑空時間的方式。在英國一個工人工作完畢以後，除了看看他所喜閱的報紙的娛樂版，或是到酒館去喝喝酒外，就再也不做什麼了。為工人組織的學習班很少，同時也不涉及政治，至於語文班則完全是為富有者而設，只有在大學中才能找到。可是在蘇聯

，一個人的時間是如何地充實呀！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到在英國充滿着那些使人不愉快的事。

去年冬天，就在晚上我也沒有時間坐下來打算要做些什麼事情。我的工作大綱和別的許多人一般，是這樣的：俄文班——為幫助外國人學習他們認為世上最難的東西（俄文）而組織的；政治班——現在我終於能夠學習那些使我最感興趣而且與我的日常生活密切接觸的事情了；管弦樂隊——許多學生決定要組織一個樂隊，而因為我知道一點音樂常識，所以我就被選舉出來負責組織；此外還有和更小一點的學生們成立工藝小組，各種會議，討論會等等。現在是夏季，工藝小組較少了，但仍無閒暇時間，因為要照料花園，以便使我們的村落更美麗一些，還有各種的運動。關於這種種事情，最使人驚異的一點，乃是此種教育和高等文化生活的機會，不是開放給少數人物，而是開放給所有願意參加的人們。

回顧我在蘇聯的兩年，值得驚異的是每個生活進程，都是大踏步地向前邁進的。當我初來時，差不多各方面都落後於我在英國所看見的標準；可是在今天我

們所見卻是另外一回事了。譬如商店，從前很少存貨，窗戶是一次又一次地修補着，直到裏面的貨物都難得看見了；除了在合作社很難買到東西，而在合作社也總是充滿着一排排顧客，所以買食物要花費很多時間。就是在莫斯科這樣的地方，多數飯店也是骯髒而且昂貴的。地方的交通站也夠不上說是交通站；鐵路特別的壞，在火車上旅行不過得耗費時間而已。

兩年後的今日，何等的不同啊！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是想要的都有買了。價值更便宜而且數量也更多。商店中裝飾精美的門面很足以引起人們走進去。從前那種難看的補綴已很快地消失了。因為廢除了每日口糧制度，長的行列也沒有了，現在有的是清潔而面帶笑容的店員們的迅速而有效的服務。飯店也同樣發生了變化，清潔和舒適方面是無疵可求的，而招待也很周到。交通站也改良到出人意料的好，當莫斯科地下鐵道完成時，我們便看見了世界上最好的交通站。

在蘇聯最偉大的地方，還是我們居在這裏的都能了解我們為什麼要工作，我們可能缺乏我們所願想的許多奢侈品；而且對於外國人，有時候生活也會相當地

困苦，但是我們都能諒解。

最近我在高爾基城參觀一個巨大的自動車工廠，看見那些為建設工業化國家所絕對必需的整千整萬刻有「美國製」字樣的機器，我使更清楚地認識了爲什麼麵包和牛油曾被限制，而一年左右以前其他的物品爲什麼是那麼稀少。現在我們竟能如此迅速地從艱苦中得到收穫。因此我相信理想中的國度一定就是蘇聯。

英國：刺拉、亞希比——高爾基「第四國際學校」教員

巨大的變化

在積極參加蘇聯生活和工作已經四年之後，要想說出對蘇聯的印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四年之後，蘇聯生活已經變成你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你自己的生活已經如此深深地溶入蘇聯之內，你再無所謂「印象」，而只有真實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不到你加以思考並準備寫在紙上，差不多一直在不知不覺之中。

我已見過許多不問政治的外國工程師到蘇聯來，決心履行職務——但是不去參加社會的或政治的生活，然而沒有一個能夠堅持這個立場。有些在這兒居留了一些時候就回去了——但是多數留了下來，有些成了蘇聯公民，而全體則都成了蘇聯的熱愛者和保衛者。的確，此間生活內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那種沸騰一般的活動力，它包圍着每一個人，把他的能力全部吸引出來，并使之向各方面盡量發展。這就感染了所有的外國工程師，無論他們到蘇聯來是否由於共產主義的信仰。

即以我來說，當我到莫斯科時，我已經在英國共產黨裏做了五年黨員，因此我自以為可以容易地參加這兒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在實際上我才發覺還有很多東西我不懂得，我的很多概念還必須改換。在工作方法上特別是這種情形在英國資本主義的實驗室中和工廠中，一個人慣於在當然的規律下執行命令；工程師們極少能決定自己要做些什麼事；高級的上司幾乎高不可攀；負責的位置通常總是授與站腳最久的那些人；個別工程師的創議權是極難得到的，關於這類問題我發覺此間的情形大不相同。

我和另外一個英國工程師在一九三一年應聘來莫斯科「交通科學研究所」工作，擔任遠距離交通測量器的設計。我們在十一月初到所，數天之後，即奉令按照研究所的總計劃把我們在來年一整年的工作製一個詳密的計劃。這對於我們是一種完全新的情況，因為我們向無製作此類計劃的經驗。但是，我們的計劃終於被接受了，而且我們不顧一切困難把它完成了。我們不久就遇着了一種新的工作方式——社會主義的競賽和擔任社會主義的志願工作。我們宣佈我們決心做突擊

隊員，擔任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志願工作，以完成我們的計劃，製作合理化方案，等等，並且向別的突擊隊挑戰，看誰做得更好。

不過，起初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做得不大好，當時正施行了一種給薪的方法，薪金多寡按照計劃完成的程度而定。雖然就實驗室全體而論並未完成着它的計劃，而且別的工程師們所得薪金較少，但是我們兩個因為契約已有規定之故，不受影響，仍舊領得全薪，於是我們要求依照那些俄國同志們一樣的標準受薪。第一個月我們所得較少，後來却超過我們的計劃而與實驗室其餘諸人一道得到了更高的報酬，因為實驗室全體也已工作得更好了。

可是，直到後來在我們的一個工廠內更加困難的情況下工作的時候，我才真正開始懂得社會主義工作方法的真正性質。舉例來說，以前在認担社會主義的志願工作去完成某一節目時，我們曾經堅持這樣的條件：譬如定要其他工人完成一項附屬節目或是定要管理部供應某些材料。但是在工廠裏我才知道一個真正的「烏達尼克」（突擊隊員）是不要附加這類條件的，他只是責成他自己注意使那些

附屬節目要如期完成，責成他自己去明白指示並防止他們那些工作部門的延誤。以前，我不懂得怎樣能夠使自己替別人的工作負責，而不免要說：『因為他們沒有完成他們的計劃，所以連累到我嘍。』可是，在精力飽滿的工廠工人們的領導之下，我覺得如今我已能更加充分地認識社會主義工作方法的意義，懂得它是如何地發展着創造性，一種願念全部工廠工作的責任感，以及一種把工廠認爲自己工廠的更深刻的了解。

我清楚地記得一年前我們實驗室的一次會議，當時我們在討論斯大林的「六條」是如何恰當地適應於我們的實驗室（註一）。在講到對舊資產階級訓練出來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所應採取的態度時，一個蘇聯同志說道：『我們的實驗室中沒有舊資產階級的專家，所以這一條對於我們不適用。』但是我指出他們的實驗室中有兩個受過資產階級訓練的外國工程師，所以他們對這一條的態度可以由對我們的態度而表白出來；我並且斷言道就是爲的要使我們成爲蘇維埃的專家。他們一致贊同了我的主張，這是我樂於述說的一點。

變成一個蘇維埃工程師的道路是不大好走的。起初我們遇到很多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困難，這就是一個夠大的障礙了。最初我和另一個同事的英國工程師遭遇了我們實驗室主任的強烈反對，在六個月後他請總管理辭退我們。可是在一個持久的鬥爭之後，賴有黨組織的援助，我們得到了一個有利於我們方面的決定，結果是主任撤職。這年的末尾我們得到了獎賞，正就是爲了他所批駁得體無完膚的那項工作。我們的激烈鬥爭只是暫時影響到我們與他之間的關係，現在他是在一個廠裏工作，在我們所設計的一種裝置下組織着大量的生產。

在兩年的技術研究和設計之後，我得有機會幫助各工廠大量生產我們所設計的測量裝置，這是我所欣幸的一件事。在這一方面我遇到全然不同的問題，我必須去處理一個只存在一年半的小工廠，它是由幾所老屋改成的，設備非常簡陋，工人們對電氣器具的製造全不熟練，那一小羣的技術職員也並沒有高明多少。而我們的任務却是生產供長距離多軌並用的一種最複雜的電氣機械。對於一個青年工程師這是一個了不得的機會——雖然起初是有些可畏的。

在最初的兩年半中，這工廠進步甚微，出產着質量很壞的機械。但是最近九個月它却大大的變了；如今它所出產的機械在質的方面已足以與外國機械比美。而且不久就會出產一些超過同類的外國出品的器械，而且範圍也要更大許多。很有趣的是，這種發展之所以可能，是由於它是直接建基於一種計劃周密的社會主義交通制度。）

諸如此類的巨大變遷，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在於工廠中每個工人的工作興趣——不是只爲了生活，而是爲了技術的觀點以及自覺在蘇聯和無階級社會建設的發展中的工作任務。外國工程師們初到蘇聯時看見那些壁報便禁不住要失笑。我看見壁報上出現一個小通告說要開始一個要求撤換總管的運動，結果工廠果然改了組，我這才了解壁報在工廠內鼓勵生產生活和社會生活之自我批評的作用。在人們和技術人員們不斷的技術教育也是使一切進步極快的重大原因。有些青年的熱心真是可驚。下工之後他們就在工廠裏上技術訓練班，並且常常在下課之後還要跑到一個工藝夜校去聽課。我整日忙着應付各種問題，提問題的不但是技士們

，而且常常是坐在工作檯上的工人們。我每週的技術功課是用雙腳的俄語講授的，那些技術工人們總是興高采烈地傾聽着。這種技術教育的一個結果，便是我看見很多未受過訓練的青年在兩年之間便變成很能幹的技士。并且他們的發展不限在技術方面，是多方面的。他們有許多和一羣工人在一道兒經常地上政治課，學習英語德語。

現在我必須一說與我關係極深的生活的另一面——家庭生活，衛生狀況，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和我妻一道到達莫斯科，而且，一點也沒有顧慮到危險，我們決意生產一個孩子。但是，當我妻懷孕四個月之後，我們發覺她的肺病是更深了，這就是說，她在生產時會發生生命危險。黨和工會趕快設法把她送到一個婦女醫院中去，在那兒用神奇的手術把胎墮了下來。經過幾個星期的肺病治療之後，她轉到離莫斯科四十英里左右的松樹林中的「列寧療養院」，在那兒住了六個月，當那期間在右肺上順利地施行了一次手術。我到這療養院去過幾次，覺得非常完善。就是在那不足的時期，食品還是充足而且精美的。建築物空氣流通，

光線充足，潔淨無瑕。在大廳中差不多每晚有音樂會，講演或電影。我特別高興的是發現在六百個病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工廠工人，其餘是技術家，藝術家等等。並且所有的醫藥費概由社會保險基金付給。我妻在這裏好得很快，所以次年春天我已能送她到克里米亞去過一個月。可是後來他的左肺又病得更厲害了，於是她又回到療養院去住了六個多月，受過幾次手術，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

在歸訪英國的時候，我妻曾到倫敦一個最大的肺病醫院去，把施行手術前後所照的愛克斯光的片子給專家們看。他們都說她在英國也不能受得更好的治療。我個人所知則是，此種治療縱然就醫學方面說是可能比並，但是很少工程師能有受得它的福氣，工人們尤其休想——而在蘇聯却是完全免費的。並且，我妻在病前曾在一個辦事處工作了數月，所以在病中她仍有好幾個月照領全薪，以後則改為殘廢卹金（在她的情形是原額的百分之五十），直到目前她還在支取着這筆卹金。現在她已完全復原；已經開始做部分的工作，不久大概就可以如常服務了。我還得說出，在最近以前的蘇維埃選舉中，她也得到投票的權利，在莫斯科我們

這區中參加了一次很有趣味的選舉大會。

在莫斯科的外國工程師們可以暢快地消遣暇時，不感一點困難。首先，有兩個好俱樂部，『外國工人俱樂部』和『柴爾岑斯基俱樂部』——其中有一大半由工程師組成的外國人組。外國籍工程師們在第二個俱樂部內，可以經由他們交換經驗或與俄國工程師們交換經驗，並且可以在技術方面幫助別的組織。譬如我們的『地道組』就提出一些技術上的方案，實際地幫助了神奇的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建築。除此之外，還有音樂會，講演會，講習班和多種的運動設備。我看戲比在英國時更多，（並且覺得很有味），如果能夠得到門票的話，還會看得更多，因為雖然戲院已經不少，仍是供不應求，難得買到票子。這兒每個人都喜歡看戲。工廠工人們都知道那些地方有最好的戲而爭着去購票。坐不滿的戲院在莫斯科是找不出的。

同樣的現象在此間各方面都能看得出來：一方面供給固然在大量增加，但另一方面需要却在無限制地增加起來。譬如，書籍出版的數量和種類之多和版式之

大已經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然而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致常常在工藝書籍出版後一個月左右就售一空，無法買到了。這兒我們都在學習着工藝和政治，都在要求讀優秀的文學作品，所以出版物雖然在大量增加，仍感供不應求之苦。

關於衣食兩項也有同樣的情形。第一屆五年計劃專注於建設重工業——一切產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和奠定社會主義農業的基礎。這期間大量投資之所以可能，是有賴於工人階級自願的犧牲：一切食品供給都受了限制，奢侈品是絕跡的，衣服也很難得到。可是，第一屆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使輕工業的發展和消費品的生產有了可能，而社會主義農業的勝利則使糧食日益豐富起來。結果是我們看見了過去兩年中巨大的變化。一切城市裏而出現了大批頭等的現代化商店，其中充斥着各式各樣的貨物，而且貨物的品質也在不斷地改良。記得我們初抵莫斯科時，簡直沒有地方可以花錢，如今我們却可以比收入多花好幾倍了。

莫斯科如今已有大批精美的食品店，有各色各樣的食品出賣，我們胃口有限的英國人對此竟還無所知覺哩。不過，另一方面，需要也增加了，而且迅速地增

加了。工人們不僅要吃得舒服，而且要穿得漂亮，要把他們的家庭裝置現代化的用器，無綫電，留聲機，鋼琴和電器用具，並且這種需要擴張的比率也是非常可驚的。不管這些新商店的價格是如何昂貴，仍是從朝到晚充滿着顧客，一週裏面就有幾百萬盧布進了櫃臺。這就令我看出這些商店與英國商店的巨大區別：在那裏，貨物源源而出，並且老是在舉行大廉價，然而工人們還是只好望洋興歎。

並且蘇聯這種可驚的文化發展還有另外一面。沒有那一個國家的人民大衆能夠像在蘇聯這樣對國際事件具有深厚的興趣和了解。首先，在任何時機都表現出對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患難與共休戚相關的情感。舉例來說，我還清楚地記得在蔡特金女士出葬時與舉行的盛大的示威遊行以及對季米特洛夫及其同伴們的熱烈歡迎。(註二)我曾有多次不得不在會議上演說國際問題，並且每日與俄國同志們討論它們。俄國工人們的熱忱激起了外國工程師們的熱忱。我們認識：資本主義各國正在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中找尋逃脫危機的出路，用貪婪的眼光望着蘇聯；蘇聯則在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的擁護之上，利用着資本主義列強間的矛盾，

採取和平政策，避免戰爭；但是，蘇聯仍舊不得不小心準備抵禦侵略。目前，我看出法西斯德國可能是主要的戰爭挑撥者，而英國的帝國主義者集團則確實是煽動戰爭的頭目，他們在扶助德國重整軍備，竭力指使德國東進。我，雖是一個英國人，却擁護蘇聯的和平政策，遇必要時，並將盡力保衛蘇聯，因為只有在這個國家，羣衆的生活標準在不斷地上升；只有在這個國家，文化在不斷地進步；只有在這個國家，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了真正的人。

英國：愛力克，高德佛來——莫斯科「交通人民委員會科學研究所」
交通工程師。

（註一）這是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在「工業領袖分子會議」的演說，在這演說中斯大林指出蘇維埃工業發展的六個條件。此信作者所講的這一條是第五條，原文如下：「我們的任務是改變我們對舊社會出身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的態度，對他們表示更大的注意和關切，表現更多的果決來邀請他們合作」——原編者

（註二）蔡特金是德國人；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亞人。——譯者

自由

大概很少外國人到蘇聯來的原因是與我一樣的，但是不管他們的原因怎樣，我可以斷言他們多半已經享受了我在英國時一向所渴慕的東西。我所渴慕的東西就是自由；然而在英國，號稱人人自由的民主政治的國家、我所缺乏的却正是自由。

我在那裏沒有失業，有一個屋子可以安置我自己和我的父母，可以隨便騎摩托自由車，等等，那麼你自然會問，我還有什麼不滿呢？我豈不是樣樣東西都有了嗎？可是我的答覆却是「不然。」我不能自由地做我所真正要做的事情。

一個沒有在英國住過的人恐怕很難想像得出，在那裏傳統對於一個人的一生是起着多麼大的作用，因此，順從傳統是有多麼大的痛苦。我以為種種事情之所以老是照舊進行，一成不變，多半要歸咎於傳統，所以傳統是資本主義的主要支

柱之一。因此我一見蘇聯憲法把種種傳統的事物一掃而空的辦法，就覺得滿心的歡喜。

我認爲我說出這一點也是不錯的：在今日的英國，宗教之所以還那麼活躍，大半是因爲人們相信他們的朋友故舊都期望他們保持一種宗教信仰。因此，他們每逢禮拜日到教堂去並不是因爲恐怕將來要墮入地獄，而是因爲恐怕左鄰右舍和親友們說他們的「閑話」。

這種宗教的傳統並不就此便止，而往往擴張到工作上來，要是一個工人所遇的老闆是像我的老闆那樣的人，熱心進教堂而且希望他的僱員們跟他同去，那麼他便將發現他的老闆會確實地鼓勵那些肯到教堂去的工人，提高他們在工廠的地位，相當地加些工資。這樣一來，自然滿足了他的朋友們的傳統眼光，他們因此會稱贊他是一個好人，真正地把基督教傳進了他的事業。可是，這種基督教其實並沒有深入他的事業，這只要從下述一事就可以看出來。一到夏季開始，英國有許多工廠就把工資減低到所謂「夏季標準」（只有學徒不在此例）。這種季節減

薪的藉口是夏季生活比較容易。雖然那時我還是一個學徒，我的老闆却認他理應把我的工資每小時扣除一個銀幣（一辨士的四分之一），以符合於「夏季標準」。這個老闆如此作爲，多半還是因為恐怕他的朋友會把他當作一個蠢材或蹩腳專業家而輕蔑他，再不然就會對他大加戲謔，因為他沒有實行慣例的事情——換句話說，就是違背了傳統。

我曾在這兒的外國青年們中間，有時甚至在蘇聯青年們中間，聽得一些不滿的呼聲，這表示着他們全然未能賞識另一種重要的自由，而那是我所特別欣幸的——就是我們青年在這兒所享有的經濟的自由。

雖然我在英國比一般人處境較好，可是如果我的父親不在我的薪水以外大量加以補助，我就休想去進任何學院或大學。這兒的青年却似乎以爲當然他們應該在初級學校畢業之後繼續學業，根本不需要倚靠父母而獲得某種精練的技能。以後，當他們長大而需要結婚時，他們不必顧慮他們的經濟狀況，只要找得一個好伴侶，一切就不成問題了。

但是在英國何等地方不同啊！第一，青年男子必須考慮他的職業是否穩妥，如果他失掉了工作，前途就會非常暗淡，因為在英國婦女極少有就業的機會，而男子賦閒者亦所在皆有。其次，即使這許多的顧慮避免開了，十分之九還得向雙方家長請求同意。青年們在墮入情網之前必須把這一切放在心中，因為，假如他與一個不同階級的女子發生了戀愛，家長靠得住會反對的。在這場合，傳統勢力又闖了進來：如果男子方面社會地位較低，父母就會在經濟的立場上阻撓他們的女兒。但是，如果男子選中了一個社會地位較低的女子，那麼他被阻撓的理由就只是她『配他不上』，換句話說，就是不合傳統的習慣。

在蘇聯的三年中，我以為這種自由的感覺（它當然是蘇維埃法律所造成的智慧之直接結果）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東西。其次就是此間人民，印刷品和文學作品所具有的廣大的眼光。在我們英國的報紙上也有相當多的國際新聞，但是，那只是能動人聽聞的世界大事的紀錄，而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件。

我的父母總算是頭腦開明而教育程度較高的了，但是他們從未給我一本馬克

思，恩格斯，列寧或斯大林的著作，事實上我簡直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物。這並不是因為我的父母不許我研究這些人物，而是由於英國一般大眾的眼光是如此偏狹。以致這些人物在我父母的心目中（正如在他人的心目中一樣），以為並不重要。由此你當能想像得出，自從來蘇聯以後，我是如何地貪讀這一類的著作。而對於莫斯科「出版合作社」之把世界最可寶貴的著作譯成英文又是如何地感激。

在想到此間教育各方面的廣大和自由之際，我必須把英國和蘇聯的電影作一比較。我的朋友們向我推薦過許多英國片，說它們很好，可是真正能感動我的我記不出半打以上。至於我所看過的三三十張蘇聯影片則有十五張令我陶醉，其餘的也都很有趣，沒有一張使我失望，而且我只要有暇就到電影院去，並沒有受別人推薦的影響。

此外還有一種純粹的傳統習慣的顯露，它使我在英國感得非常麻煩而且剝奪了自由，那就是對於服裝的可笑的講究。譬如早起之後，雖然我是一個細木工匠

，却必須裝上領子，打好領帶，否則人家就會說我疏懶；不論天冷天熱，必須穿一件上衣，因為沒有人只穿襯衫在城中行走；在做工時必須穿上一種褲套，否則同伴們就會說我像一個學徒；下工以後，又要改換衣裝，否則在車中就會受其他搭客的輕蔑。即使我終生除作工外什麼也不爲，這在白晝已經夠使我煩惱了，然而假如在晚上我要到什麼地方去消遣一闕的話，又要按照不關的性質另換一套服裝。

在蘇聯是何等不同啊！無論上工或者下工，儘可穿上你認爲最舒服的衣服，而不需要顧慮別人的意見，這是何等的一樁樂事。看戲或者打網球，要是你高興的話，你可以穿同樣的衣服，而不會覺得有人在瞪眼望你或是冷笑着掉過頭去，這又是何等爽快的事。你也許會以爲，按照一定方式去穿衣，與在英美的其他種種好處比較起來，那也不必介意了，但是人們之囿於習俗和傳統是超乎理解以上的，而且我可以鄭重地說解脫了這兩種東西（習俗和傳統）對於我實在是具有極大的意義。

爲免人家疑心我只是盲目地讚頌蘇聯而不說那使我不高興的事情，我要提出一項批評。我很抱歉這不是一個建設性的批評，而且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出有什麼立刻有效的補救辦法。我的批評就是結過婚的青年們在一塊兒的時間太少了，換言之，就是缺乏家庭生活，我覺得這是最大的缺憾。開會，上課和種種社會工作令人忙得要命，以致極少時間在家中悠閒地讀些書和討論些時情。也許這是我的濃厚的英國人本性在作怪（我們在英國留在家中的時候太多了）。但是無論如何，這裏既已產生如此替婚姻生活體貼周到的法律，還讓如此多的空閒時間拿去應付那些如果妻子在別處做事就非單獨處理不可的事情上面，總是不近人情。這也許只是個人的事情，但是我總不禁覺得那些青年父母把他們的家庭看得太輕，我以為爲家庭對於他們應該是一種可貴的樂趣。

◎這裏上學的時間也是短促的，「少年先鋒隊」當然不可能使隊員們完全利用他們的空閒時間，所以父母們應該負起大部分的責任來教育那些將來的充分發展的蘇維埃公民。因此，我愈不贊成父母們不注意家事而過分地分心於別的事務，

因為我把自由看得比一切都貴重，我就不能不對蘇聯的建設感得更大的熱心。在這裏，一切都在尊重人民自由的範圍中進行，靠着工業化，我們從自然的束縛下得到自由的日子也已近在眼前了，所以毫無疑問地，蘇聯已經多半是，而且將會完全是，真正的「自由的祖國」。

英國：弗蘭克，費利普——高爾基「莫洛托夫汽車工廠」工人

計劃的好處

使我離開英國的原因並不是失業。我是薛斐爾德「梅特洛——維克工廠」電氣部的主任工程師。這是責任很大而且專心致志的職務。

還在英國的時候，我就已從到過蘇聯的人們那兒聽得說起蘇聯工藝的進步。我想要親自去看看這些工藝的成就並幫助蘇聯。

於是我到了莫斯科。

我必須承認我最初對蘇聯工業有些太不正確的揣測。我發現這個國家技術知識的一般水準之高，大非我始料所及，所以不勝歡喜。我絕對想不到在歷史上的著名落後的一個國家，能夠在如此短的期間達到與先進歐洲諸國同等的技術水準。

老實說，我沒料到我能在這裏遇見這麼多有技術訓練的能幹的專家。

在「基洛夫發電機工廠」我是牽引馬達技術部的高級工程師。這是責任很大

而趣味很多的一個職務，充滿着新的問題，比我在「梅特洛——維克工廠」所做的事有越多了。我努力把我的學識和經驗供獻給工廠，工廠亦轉而供給我以豐富的經驗。

對於一個工程師，一個機器製造師，在蘇聯工廠的工作是非常值得滿意的。統治着資本主義工業的商業原則常常迫得工程師們白白地耗費了他們的精力和學識。譬如在英國，好些工廠生產着同樣的商品。一有定貨單到來的時候，每個工廠都不顧一切地去爭奪它。被僱用在這些工廠內的工程師們一齊開始製作新的機體圖樣，誰也不曉得他的工廠究竟是否能夠把定貨單爭取過來。但是結果總只有一家工廠能夠把定單搶到手。於是所有別家的圖樣都歸於無用了。

在蘇聯則完全不同。這裏一切事業都是與工業的發展聯繫着的。這就使得每一個工程師有把握他所做的工作必能夠應用。在這裏沒有一種有價值的設計不會轉換為實際的價值。經濟計劃制度使得工程師能夠看見他自己創造的成果。而這對於他是最可寶貴的一件事。

現在我已在蘇聯住了六個月，已經能夠看見蘇聯專家們的一些成績，他們努力工作着，懷着滿腔的興趣和熱忱。

而且不是奇怪的。他們是在爲自己工作啊。

英國：亞諾德，塔斯汀——莫斯科「基洛夫發電機工廠」工程師

他們都需要和平

在德國，我曾在鑄鋼廠和鋁工廠的瓦斯部做了二十八年的工作。最初是當工人，後來在一個專門學校畢了業，於是就當工頭。我在那學校里學習了三年頭。在夏季我做工，儲蓄金錢，在冬季我就學習。在德國是沒有人肯爲我付錢讀書的，不像在蘇聯，工人們讀書可以得到政府的資助。

在一九三二年我被聘來到蘇聯，那時我正想來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工作，於是我欣然接受了聘請。現在我在「康斯坦丁諾夫卡鋸工廠」的瓦斯部當主任。

我在蘇聯覺得一切都好，對我的工作十分滿意。在執行我的職務時，我沒有碰到一點阻礙。在德國我是當工頭的，有一百個工人在我的管理之下。而這裏我管理的人比較少些，但是我的責任卻更完全；我對於自己這部門的工作要負全責。

。這就是我對於我的工作覺得如此有趣的原因。

在我與上司的中間從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執。我的學識和經驗都很受賞識。不久以前我提出一個建議，八天之內經理就發出了命令來使這個建議，見諸實行。

至於俄文，我一向來都在自己學習着。不過最近我遇到了一個留居蘇聯已達十年之久的德國人，從此以後他將幫助我的學習。

對我本工場的工人我都很滿意；他們都是很有訓練的。但是在整個工廠中，我時常看到一些令人生氣的事。工人們對於他們的機器還沒有弄慣，不知道怎樣來處理他們。這是因為他們並不是一向來就是工人，而是新從農村中出來的農夫。我曾看見那些裝配器械的工人經過亂拋在地上的自己的工具旁邊，有時甚至被工具絆了腳，但是總不肯把牠收拾起來。他們還沒有弄慣，不過這是一些年紀較老的工人們的行爲，年青的工人們卻決不會做出這樣的事，同時我相信五年以後，像這類的事也不會再有了。

當我來到蘇聯的時候，這個工廠給我一個裝有電燈與暖氣設備的住宅——完

全是免費的。那是很好的住宅——溫暖而且乾燥——附設着必需的每件東西，比如儲藏室和棚廠等等。在屋子的外面還有一個小庭院。我在這裏造了一個花園，種植一些樹木和花草。這是很喜歡做的一種工作。因此我曾要求工廠另外運給我一塊土地，把它闢成一個蔬菜園。現在我自己已有蔬菜了，如夏季的馬鈴薯之類，因此我已不要向工廠去領取我那份應得的蔬菜。

工廠當局爲我的房子裝置得很完備。我能得到我所要求的全套衣物。至於食品，我所常去的那個食堂是很好的。但是，正如一個真正園藝家一樣，我會願把自己的食料在家裏烹調，所以我並不每天到那裏去用餐。

有閒暇的時候，我就在我的花園或菜園裏工作。假若我對這些感到有點厭倦的話，我就回到工廠裏去。除此以外我不到旁的地方去。不錯，我還到戲院裏去過一兩次，特別是當列寧格勒舞隊游行到這裏的時候。有時我也看看電影。我喜夏伯陽』，以及一個在高加索攻打反動的白軍的影片。

我看『德文中央日報』，康斯坦丁諾夫卡日報——『工業報』，每兩週我收

到「國際文學」雜誌，這些就是我所看的報紙和雜誌。

在這裏的三年中，每年我都得到一個月的休假，每次都由工廠送到一個休養所去。我曾到過基斯羅伏德斯克，索奇，和雅爾泰。

這裏使我特別喜歡的是：你在工作中不會遇到一點挫折，無論何時總是在增加着生產。當我在這裏的三年中，我從沒有看見任何地方有生產萎縮的現象。在蘇聯是不知有恐慌的。

蘇聯需要和平；不要戰爭。我曾經和這裏許多人談過，沒有聽到有任何人說需要戰爭。他們都需要和平。

德國：約瑟夫·海爾
頓巴斯「康斯坦丁諾夫卡」工廠主任

夢想實現了

我的勞動生活開始得很早，並且充滿了貧乏與困苦。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就在一個私人工廠裏開始做學徒。每天工作九個十個鐘頭，在第三年每週賺得三個馬克，第二年五個馬克，第三年八個馬克。三年學徒期滿以後我得到助理裝配工人的資格。

在這三年中我沒有休假過一天，但是以後的六年却是「一個長假」。飢餓，無家可歸，我流浪全國，企圖尋找各種職業，但終歸無效。

好久我就夢想到蘇聯去——我這個夢想終於實現了。現在我是在烏拉爾機器工廠當第四級的裝配工人，每月的薪金不下三百個盧布之多。

蘇聯歡迎我，愛護我，如同母親之愛護她的兒子一樣。

在法西斯德國，工人們時常被失業的鬼怪所纏，直到他們中許多人，由於貧

困和飢餓之故，變得自己也像鬼怪一樣。可是我在這裏所遇見的工人卻都是健康的，快樂的，微笑的人——我的同志們和本階級的兄弟們。這裏我們全體——工人們和領導者們——無論在工作中或是閒暇的時候都是朋友和同志。

我發現同樣年紀的蘇聯少年們比我懂得更多。所以我花費許多時間來學習，爲的是要趕上他們。

我有一間好房子，房中有收音機和我所必需的工具，食品是價廉而且物美。在閒暇的時間我到「外國工人俱樂部」去，上政治課，參加宣傳隊的工作，跳舞，尤其是學習俄文。我已經讀了很多東西。

我已經讀過潘菲羅夫「布羅斯基」，愛夫德盈科「我愛」，梭羅阿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等書的德文譯本，每天我還讀報紙。

這是在蘇聯的第一年，在這年，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將得到一次休假。我相信它一定會過得非常有趣。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十五人的小隊，計劃在丘索瓦亞河與卡馬河上坐小舟作一次遊歷。我們準備去參觀烏拉爾的各工廠，城市和鄉

村。

在蘇聯的這年，我已看過數次歌劇，看過「霍夫曼故事」，「卡門」，「愛達」及其他。在電影院中我最喜歡的是「瑪克辛的少年時代」，不僅是因為它使我追憶到我在法西斯德國與共產青年團所做的地下工作，並且因為它告訴我許多東西教育了我。

當我初次到戲院裏去時，最使我驚訝的是座位都被佔滿了。電影院前有一排排的人在等待着入內。不消說，像這類的事在法西斯的德國是決沒有的。

可是要把我所能想到這類例子一一舉述出來，那一定要花費很多時間。總之，這一切都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結果。

德國：漢斯·卡爾米勒——史維得諾夫斯克——烏拉爾機器工廠——裝配工人

從斯卜里到伏爾加

一九三〇年蘇聯在柏林招請工人和專門技工。我去應徵，結果被錄取了。同年七月我就動身到蘇聯，爲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務。「你是到蘇聯去嗎？」在那時有一個柏林的朋友對我說：「你認識蘇聯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在那裏有怎樣的困苦在等待着你的嗎？」「不錯」我答道：「無論什麼地方都有困苦的。那裏有千萬的工人能生活，我當然也能生活！」

真的，離開資本主義的德國我沒有甚麼損失。縱然我曾對祖國有過任何愛國的觀念，但是也終於消失掉了。因爲我想到在一九二一年德國中部區域暴動事件以後，社會民主黨政府如何把我捕入獄中，在那裏被囚好幾年，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次稍延很久的大赦才把我釋放出來。當我更追憶到：因爲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不能適合工廠老闆的口味，以致在後來的兩年中被解雇達五次之多，於是法

西斯德國對我完全失掉了吸引力。

現在我已經看見過伏爾加河五次溶冰了；恰如夏天我趁閒暇的時間，在柏林斯下里河岸晒太陽一樣，如今我常在伏爾加河游泳，發現太陽在這兒照耀正像在那兒一樣。當我還在德國的時候，我曾經讀過列甯，高爾基，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人的著作。同時我還學會了俄文，因此現在我能更廣泛地瞭解蘇聯的文學。

蘇維埃生活的中心自然是工廠。我的職務是在工具製造廠當工頭。我們的工作是在同志的樂園中進行的，無論經理部或工人都是一樣。解決困難，克服困難，都是羣策羣力，而且我們都以熱忱去完成付與我們的計劃。在一九三一年，我的健康稍受損傷，於是被送到克里米亞的南部海岸休養一月。在那裏我很快地復原了，並欣賞了美麗的風景，然後以重新精力回到工廠裏來工作。

因為我的合理化建議和改良，我得到好幾次獎金。

一九三三年秋天，我在索爾莫夫的外科醫院受了一次手術，我得到良好的醫

治，並且因當地的潔淨而感覺很愉快。

至於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妻是在蘇聯生長的，我們一塊兒過得很好。我們有兩間房子，這已很夠我們居住，食品也很充足。

我們所居的這棟宿舍，設有一個「紅角」（俱樂部）以其中有一個好圖書室（裏面有德文和俄文的書籍報紙）。我讀工藝雜誌和報紙——「真理報」和「德文中央日報」工廠報及其他。

在這裏誠然還不能使我們的生活真正舒服，但是我們正在以最高速度前進——工業，農業，文化，各方面都在飛躍地發展。而我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看見的卻是反動，法西斯和野蠻。

德國：克魯卜——高爾基附近「赤色索爾莫夫工廠」工廠

工作滿意的國家

我在慕尼黑「工程學院」卒業以後，曾經做過德國著名專家巴索夫博士的助手，其後有二十年（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三三）我在德勒士登「工程學院」的建築材料化驗研究部主管凝結物質的實驗室；我爲士敏土的生產製出過新的技術程序，而對於阻止使建築物衰敗過早的原因尤特具心得。在這段期間，我有七十篇論文發表在工藝雜誌上；我可以特別提出來一說的是我在利用工業廢料（溶滓，灰，等等）去作建築材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德國的工作開始逐日地令我不滿意起來。我決定到蘇聯去，因爲我認爲一個人在那兒比在任何別的國家更有機會去運用他的學識並求發展。

在蘇聯，最能夠引誘我的是大規模的建設，以及由此而開放的大量機會。除此之外，我還聽得說過科學研究院的設備是何等地精良。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到了蘇聯，如今正在「東方建築器具研究所」當顧問。這工作使我完全滿意。我在此覺得十分安適，而且我要說，沒有那一國能夠像在蘇聯這樣從工作中得到這麼多的樂趣。在外國，如此衆多的人們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地方，不僅工作本身不能給人以什麼滿足，而且就是在閒暇時候，「想到那追逐在入人身邊的失業恐怖，連休假也覺得索然無味了。你試想想看。如果你看見在你身邊走着的是失了業的餓得半死的人，你還能從你的休假日子得到什麼樣的快樂。

我在蘇聯特別喜歡的是大規模建設工作，每天提出新的問題需要迅速予以實際的解決，以及新方法的立刻採用。這就好像是在激戰之中工作，在這兒我們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們是直接參加建設的，可以把我們的研究結果立刻加以實證；在德國我們的工作卻多半限制在理論方面，不能確知自己的工作結果是否能有實施的機會。不足怪的——因為在一九三三年只有百分之二五到三〇的士敏土廠還沒有關門。

我在這兒的工作中發現我有權查驗我僑顧問的那些部門的工作，而且我的建議總是承所長仔細考慮，這也是特別可喜的一點。

關於工作的基本問題我可以直接與研究所所長格萊蒂托同志商量，關於日常問題則提交諾伏塞夫斯基同志。我與他們交情極好，正如與我身邊的每一個人的交情一樣。不過，因為不懂俄文之故，無法做更密切的接近。幸得所中有些首長們能說德語，這對於我在工作中是太大的幫助。同時，我正在盡力學習俄文，如果我能得到一個人與我同往博物館，戲院等地去的話，我定會非常高興。因為這將幫助我更快地得到一種語言的實際知識。

關於蘇聯工人們和專家們，第一令人驚歎的事是這兒的人們都覺得而且懂得他們國家的各項問題，這國家的不斷進步已經對他們發生了鼓舞興奮的影響。特別顯著的是他們對工作的熱愛。在德國，人們也愛工作，但是現今那種工作的熱愛卻衰落下來了，根源就在危機所引起的普遍的崩潰。不過，我必須指出，在這兒，紀律——或者不如說，自我紀律——是不夠的，負責人員所提出的任務和任

務執行的方法，這兩者都常常缺乏精確。我認爲此種缺陷的根源應該在管理機構的中間環節找尋出來。有時候情形是這樣的：經理部不成問題，工人們也都心願迅速有效地執行命令，但那些中間分子沒有足夠的學識或能力去組織他們下級的工作。

目前我住在一個旅館裏面。我的房間是十分舒適的，食物也價廉物美。事實上我應當說食物的確是很便宜的，可是不幸的是啤酒並非如此。我在德國時慣飲啤酒，在那兒每瓶只花一頓中餐價格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這兒一瓶啤酒卻等於一頓中餐的價錢。在我想來這是很貴的。

我怎樣消遣閒暇時間呢？簡單一些，我可以這樣答覆：我已五十歲了，凡我所心愛的娛樂我都能在此盡情享受。差不多每天我都要上「職業俱樂部」去，在那兒玩賞圖畫雜誌如「建設中的蘇聯」之類。我愛林中閑步和運動。在這兒此類機會是很多的，因爲蘇聯對休息和娛樂的適當設備非常注意。

我曾到歌劇院去過幾次，看過「浮士德」，「里郭勒託」，「駝背馬」，

「霍夫曼故事」，「波立斯、哥獨諾夫」。我特別喜歡蘇聯的歌舞，它有崇高的藝術標準和嚴格的訓練。

我又看過三張影片，其中一張——「莫斯科笑了」——我覺得很有趣。我願多看電影，但是買票要花費很多時間，因為觀眾太多，座位不夠。如果發行十場一張的預定券那定是一件好事。

至於書報，我有充足的供應。我是「德文中央日報」，「莫斯科每日新聞」及法文「莫斯科新聞」的經常讀者。除此之外，莫斯科電台的德語廣播時間使我得知所有最重大的事件。總之，我如此得到的消息對我是足夠了。我唯一的願望是增加德語廣播，因為報紙寄到這兒更難得。諾夫斯克來要費些時間。

今年我不想有假期，但是明年我想出國去看看我的八十歲的母親。

結尾，我必須說蘇聯的確是一個奮勉的和平勞動之國，是一切國籍勞動者的真正祖國——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且逐日成了我更堅固的信念。在這樣一個廣大而且迅速發展的國家，具有如此豐富而且燦爛的前程的國家，一切都服務於經濟

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國家，不如此還能怎樣呢——反之，資本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德國卻是處於危機的掌握之中，在現有經濟制度之下沒有將來的希望，而且想在一次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中找尋通過難關的出路。

還有一句要綴在後面。在蘇聯令我驚愕的不僅是巨大的電力站和其它在限定時間中建設的工廠，而且是工作進行的非常的速度。顯然這這兒的決定因素就是良好的計劃加以羣衆的無比的積極性。

爲長遠的前途施行計劃只在蘇聯才有可能的一件事——一切利益，業已由蘇維埃五年計劃光輝地證實了。

德國：盧夫希支，士敏土與混凝土專家，史維得諾夫斯克

「東方建築器具研究所」研究員

果然是真的

還只有九歲的時候，我已經在一個鐘錶製造廠當差役。因為我很喜歡這門技術，所以後來父親就送我到一個鐘錶匠那裏做學徒。那裏的生活是很辛苦的。有一個很長的時期，除了食宿以外，我沒有得到一點工資。每天工作達十二小時之多，——有時還要更多些，為差遣而奔走着。我的師傅是一個粗暴而兇悍的人，我終於離開了他，回到我從前曾經在那裏當過差役的鐘錶店。後來我居然得在一個較大的鐘錶工廠工作，一連在那裏做了好幾年。

因為工作的良好和努力，我得了二筆獎學金，被送到一個鐘錶專門學校去學習，一年半後通過考試，我取得了鐘錶機械師的資格。

我懷着一團高興離開學校，但是這一團高興是不長久的，當時已是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最盛的時候，因此我這門技藝也全然找不到出路。在這樣情形下，我只

得有什麼工作就做什麼，我在一個製餅店中找得一項工作；後來又到一個造紙廠中去；以後又做了郵差。這是我在德國最後的一種職業，終於又被解雇了，將近有十八個月之久我找不到任何職業。

我得到一點微少的失業救濟金，當我到工作介紹所去登記的時候，——在那裏我聽到關於蘇聯的事情。那些失業的人都說：布爾什維克人正在莫斯科籌辦着巨大的製錶工廠，並且這些工廠裏還沒有人去做工，因此他們很歡迎外國的工人去。

最初我不相信這回事。到處充滿着恐慌，到處充滿着失業的人，而他們那裏沒有人去工作。這是不可能的事！

誰知果然是真的，當我會到蘇聯商業代表團時，他們向我担保說：這種工人在蘇聯確是需要，而且還保證有很高的薪金和住宅的設備。

考慮一番之後，我決定到蘇聯去，我的朋友和親戚都來勸阻我。他們說：『你要到那裏去？你難道不曉得蘇聯是在鬧着飢荒嗎？那裏的人都快要餓死了，布

爾什維充黨人都是野蠻的生番啦。」

我開始搖起來，終於還是被一個同去蘇聯的同志說服了。

我的父母含着眼淚把我送走了，他們深信我是正在走向死路。

我到莫斯科是在一九三一年。立刻就弄明白了，關於蘇聯飢饉的謠言，原來不過是一些無稽之談。在這裏沒有人餓得要死，恐慌是根本沒有，工作是如此其多，以致沒有足夠的人手來做他，布爾塞維克黨人都不是生番，相反地卻是一些精力飽滿的人，他們正建築着一個又一個的工廠，組合着巨大的企業。商業代表團所應允我的並無一點「花頭」；都是真確的事實。在莫斯科的確已經建成了一個製錶工廠——其實還不祇一個，有兩個哩。這些工廠和德國的那些小小的鐘錶工廠顯然不同，巨大明燈光輝煌的工場，精巧的機器。充足的光線和空氣，僅僅缺乏一件，而且這種缺乏到處都是一樣：就是沒有夠用的熟練工人。

暫時我們是被撥給了旅館中的一個房間，我便開始以一個機械師的資格去工作。

最初我覺得有些不舒服。在我周圍的俄國人所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而且我覺得他們似乎在笑我，但是我不久就明白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些俄國人都當於最真誠的同志般的熱愛和同情。

這裏許多的事情對於我都是新鮮的。其中有不少使我覺得驚異。比如工頭，指導員，和各部的首長，甚至經理人，都用一種簡單的，直接的，同志般的方式對待全體工人。假若有任何工人企圖利用這點而懈怠他的職責時，那麼他們便召開會議來向他解釋，這是不對的行為；這樣一來那個工人就會覺得羞恥，而開始對他的職責採取一個更正確的觀點。

這兒另外還有一個現象使我非常覺得驚異。各種會議開得十分地多。關於工作的問題都提出在這些會上討論。不僅工人們有參加批評的分，並且工人們自己可以批評他們的上司，無論大小，就連對管理員也不予以寬容。過後，當這些上司們遇着工人的時候，就像未曾發生什麼事一樣。他們甚至還好像更相親愛了，工作也更努力了。

在這兒此即所謂「自我批評」，並且對它提倡不遺餘力。試舉一例來說，我們的工場是出有自己的報紙的。它包含的全是本工場中工作者所寫的論文和紀錄，如果這報紙未能指出那些做得不對的事情，那麼人們就說：「這是一個壞報紙，自我批評的精神不夠。」

在剛開始時我覺得有點困難，後來我開始懂得一點俄語，得到了自己一間房子，於是我就從事於社會工作。現在我覺得蠻好。我替報紙寫文，甚至還用我的力量為「國際紅色救濟會」經營了一個報俄的發行。除此以外，我還是一個音樂隊員，加入了音樂組，我的口琴演奏會得過七十五個盧布的獎金。

在一九三二年，當我的每年例假時，我回到德國去探望我的雙親，我的朋友和親戚都很驚奇地注視着我，圍繞在我的周圍，向我遍身撫摸。

他們說：「我們不懂你怎麼還生存着，奇了，你還長胖了一些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是在那兒人都要餓死了嗎？」

假期完畢以後，我仍來到蘇聯。

順便還講一點關於假期的事，在德國他們是沒有假期的，僅有的能夠得到一次假期的人是那些年紀很老而受賞識的工人，他們做工已達二十年之久。這種假期不能超過六天，而且還要算是老闆的特別恩惠。可是在蘇聯，工作六個月之後，任何工人都有休假兩星期之權。怎樣的一個差別啊！

如今在工廠中大家已經很能了解我了，我被認為一個優秀的社會工作者和機械師。於是我在政治方面也盡力求多學習一些東西，已經買來了列寧和斯大林著的書籍，而且正在努力閱讀着。

我在工廠中認識一個名叫齊尼亞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與她結了婚。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女孩，過着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

我對我的祖國覺得十分習慣，對它深深地感到依戀。自從我開始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後，這種感情便變得更加強烈了。一九三四年二月本廠的工人們選舉我為本區蘇維埃的一員。目前我在蘇維埃產業部中工作。我檢查麵包店，商店和市場。我留心使工人們得到好的麵包，不許發生成排的人站着等購物件和詐騙的

事情。我有權把那些破壞蘇維埃商業法規的人帶到法庭上去，我的妻幫助我履行這些職務。

我已經發現了我真正的家庭，在這裏我不再像在德國一樣覺得自己是一個分子，而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家庭中平等的一分子。

德國、亞爾弗勒德·利希特——莫斯科「國家鐘錶工廠」製錶技師

蘇維埃法庭

我想談談在蘇聯使我感動最深的事：無產階級法庭的公正和接近民衆。

但是首先我必須談談自己的事。

我是德國人。我生在威斯特伐里亞，畢業於「柏林工程學院」，然後在哥斯納一個大化學工廠服務了五年。我努力工作，實驗，終於發明了一種提製砷化鈉和硼酸的新法。我本可以把這些新法專利起來，但是專利權證書不過是幾張紙，而我所要的却是親見我的發明付諸實施。但是經濟恐慌壓倒了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因此也毀壞了對此種貨色的需要。我的筆記和計劃對於我成了刺眼的東西，因為我一見它們就想起了我的長期辛勞是白費了。

創造的衝動充滿我的內心。它找尋着一個在德國無法找到的出路。

一九三二年我到了蘇聯。

我還需要說我採取了這一步驟是怎樣地愉快嗎？這兒我在「複合物質研究院」蛋白質部做事。我親見我們工作的結果，親見我們的試驗管，曲頸蒸溜瓶和蒸溜罐所產生的知識把工業發達起來。我並不把我的時間全都消磨在實驗室的四壁之內，而是參加着蘇聯的繁盛的生活：研究院常常到派我莫斯科，高爾基和教得沙去做科學工作。

我在蘇聯完全成了另一樣的人——愉快而且活潑。我感覺生命在我周遭沸騰，我看見無產階級制度的合理設施。

人民法庭給我的印象最深。我曾與它有過密切的接觸，深有感於它與資產階級法庭之間的重大區別。我在蘇聯法庭的經歷值得詳細敘述。它們可以說明我熱愛蘇維埃制度的一個原因。

我和本院一個研究員愛德林同志合力研究，完成了一個重要的發明，它可以使蘇聯自動車和牽引車工業不再需要向外國購買軟木塞子，因而每年可省數千金盧布。這發明的大要是從蘇聯大批出產的某種樹皮提取原料來製造塞子。在我們

的工作完成之前數天，『建築學院』一個研究員，科勝茨基，忽然來訪問我們。他表現很熱心，詢問我們工作的詳細情形。我們毫無疑慮地把這方法的要點告知了他。他以後又跑了來，看了一些已經製好的樣品。我們對這些訪問都不以為意。不料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我們去向『發明委員會』請求發給專利證書的時候，竟被拒絕。原來科勒茨基已經先去請求過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已經把我們的發明署上他的姓名去註了冊。於是我們向法院起訴。

列寧格勒『中央區人民法庭』立刻審訊我們的案件。我們勝訴了，但是科勒茨基不服判決，提出上訴。這案子在『上訴法庭』重審，我們又勝了。科勒茨基竄改了一些事實，又求得一次重審。我們的案件發交『中央區人民法庭』重審，不過這次改換了法官，結果仍然是我們勝訴。但是，科勒茨基還是要求上訴，然而，『上訴法庭』重行判定我們是發明人。這樣，我們的主權得到了四次肯定，終於獲得了證書。

當我想想這事件的時候，我問道：鐵爾曼，你想你能夠在一個資產階級法庭

中打贏這場官司嗎？然後我回答道：靠不住！你的對方會把你拖過一個又一個法庭，於是你就只好賣掉你的一切來請律師，付訴訟費。如果你沒有錢，那你就休想你的案子能得到受理。因為在那裏案件的判決不是有理者勝而是有錢者勝，誰能背後把案子送到法庭裏去，誰能請得更大的律師，誰就可以勝利。可是我們的案件在蘇聯法庭審訊過四次，卻沒有花費一個錢，因為在蘇聯，發明人是不要付訟費的，而且我們的案件是由研究院請律師代辦的。蘇聯法庭的省費，使得一切人都可以進去，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我特別感動的是這兒的三個法官之中有兩個是工人，而在德國法庭裏面三個法官都是頑固的官僚。

我還有感得驚奇的一點是「蘇維埃上訴法庭」并不只是固執法律的條文，而能深究每個案件的本質。「上訴法庭」的審判官不是一個化學家或工程師，但他對兩造所提的問題是非常深遠的。誰都可以看出來他是已經洞悉根源。

我與蘇聯法庭還有過另一次接觸。一九三五年一月底，我為住宅的事被傳到

了「人民法庭」。那時我是在某家的住宅租得一個房間，我出了很高的租金，才得爲暫時的房客。後來卻發覺這一家已經把這房間出租了五年。住宅委員會知道了這事，爲杜絕居奇取利起見，請求法庭把這房間充公，因爲這一家分明已不需它，同時令我遷走。法庭判決把這房間充公，却轉發給我了。由此可以看出法庭是如何地不拘空洞的形式（因爲我並沒有送上一張請求轉發房間的呈文），如何公正而且迅速地判決了案件。

蘇維埃法律就是這樣地保護着勞動人民的利益，即使他們是外僑。

我的理想

一九〇五年十月四日，在遼遠的印度，旁遮布省耶拉普爾一個小村中，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凡在場的人們都認為不幸。一個農家新添了一個呱呱吵吵的嬰兒。『又多添一張餓口要餵養了，』這就是迎接嬰兒的第一聲。孩子被命名雷·麻拉達拉，而且活下來了。

那一個高僧能夠預言他的命運呢？那一個巫術師在觀測星宿或為這窮小子看手相時，能夠知道孩子在長大以後會渡越兩重海洋到美國去進工藝學校，得到三張文憑，後來又會渡過另一重海洋，在蘇聯『卡齊斯基工廠』做了第一號工場的主任工程師呢？誰能料得到這個呢？

但是當這一切已經發生之後，我，雷·麻拉達拉，卻能夠說出來了。
在童年時代我牧牛，到村學去讀書。一九二〇年我跟父親到加希米爾去進了

一個二級學校。一年之後爆發了一場反抗英國統治的大暴動。我也參加，結果被逮捕，捱了一頓飽打。這樣就開始了我的革命家的訓練。每天我增加了對英國恐怖統治的憎恨，每天我更清晰地認識了能夠使印度得到勝利和幸福的決不是甘地的運動。我渴望着更好的東西，我的眼光轉向了『新世界』。

在印度，他們關於美國是如此地說着寫着：自由，德謨克拉西，工人的天堂，在那兒每個工人有他自己的房屋和汽車，在那兒『窮』字是被忘卻了的。總而言之，在進步的印度人們看來，美國是一個最好的國度。

因此美國也就成了我的光明的理想。我最美好的夢便是到美國去。（當時在印度對蘇聯差不多全無所聞。）

我積蓄了一小筆金錢，在一九二五年到美國去。我在匹茲堡大學讀了六個月，因為錢已用盡，被迫休學。於是我在『威斯汀好斯電氣公司』一個大工廠中工作了一年，一級一級地升了上去，從一個不熟練的工人升為一個裝置機器的工人，後來還擔任檢驗馬達的工作。工廠中的工作把我鍛得堅實起來，成了無產階級

的一員。但是這工作不能與學習聯繫起來。一九二七年初我就離開了工廠。我開始上午學習，下午在一個飯店中做廚房小工，夜晚則在郵局揀信。我在過度地勞苦着自己。你看，爲了取得進大學的權利我是需要五百金圓啊！

但是就是有了錢我也不能在匹茲堡大學久留下去。我的關於英帝國恐怖統治的陳述和革命宣傳使我在資產階級學生中間結了許多仇敵。我被監視起來。爲了免被逮捕，我只得離校，改進了「卡內基研究院」。那兒有些著名的教授對我發生了好感，請我充當助教。一九二九年我重回「威斯汀好斯電氣工廠」，但這次是在實驗室中，我順利地完成了若干研究和設計工作。一年之後我從「卡內基研究院」畢業，得到三張文憑——電氣工程師，物理學士和文科碩士。這要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以前從「卡內基研究院」畢業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得到一張以上的文憑。

向科學事業的門是在我前面大開着。但是我把精力多半放在工廠工作之中。我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服務，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鐵路公司。我創造了幾種

新的鐵路信號制度，大受器重。艱苦的學生時代已經過去了。的確我已開始有了豐厚的收入。成功，與名利等在我的面前。

然而這一切並不使我快樂。我發覺我的理想已被粉碎，因而悲傷得很。我當初以為美國是真正民主政治的國家，是工人的樂園，如今怎樣了呢？在我居留美國的最初幾月，悲慘的現實就已經對我發生了嚴重的影響。

我到美國後的半年之內，首先認識了金圓的魔力。我袋中一錢臭名，甚至沒有人願意同我說話。袋子空空的人受不到注意的。「對了，」我對我自己說道：「美國的真正主宰不是勞動而是金圓。人人對它低頭。」我也開始為「金圓墜下」服役起來，工作，工作，直到我的腦昏，我眼花，直到我汗血交流。我，一個印度人、爲了美國的工藝學識不得不付出了艱苦的代價！

同時，我親眼看出了著名的美國「自由」的神話是怎樣地虛偽。僅僅是幾句話，一個人親身經歷的老實陳述，就被認做了罪過而要加以監禁的處罰。

我又看見了「美國平等」的反面——對中國人和黑人的輕蔑和憎恨，外來工

人們被壓迫被蹂躪的狀況。

每次當我想到宗教在美國的作用，我就不勝厭惡。就我所見，美國人是並不信仰上帝的，但是他們傳統的教條和偽善使他們仍要進教堂裏去，而且還要拉扯別人。非止一次我不得不聽那些名教授們的宗教勸誡。『你爲什麼不到教堂裏去呢，麻拉達拉？你的無神主義不但干犯了上帝，並且對你自己也是不利的啊。』

我看見統治者羣的腐敗，可恥的政治買賣，血腥的盜劫的流行以及盜賊和警察之間的密切聯繫。美國共產黨（我已成了它的一員）幫助我認識這在崩潰中的制度的腐敗之全部內幕，幫助我對每日所見聞的那些討厭事實予以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判斷。我的粉碎了的理想，當初曾在我前面如此閃耀的理想，如今在我心中已不留一點渣滓了。美國的地位已被蘇聯所代。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呢？我想這一定是大家都明白的。

我棄掉了我的職務，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我到了蘇聯。

在列甯格勒我被派去工作的『蘇維埃托拉斯』爲我在阿斯托利亞旅館找得了

一個精美的房間。但是這種闊綽令我不安，因為在蘇聯我覺得我是在做黨的工作，不必爲我花費這許多金錢。我請求改換一個普通房間，但是托拉斯的經理給了我一棟住宅。

現在我已蘇聯住了三年，在這期間我更深深地確信我的選擇無誤。在這兒有多少值得驚歎之處啊！在這兒，工人不是像在美國那樣，在老闆面前發抖，怕看他的面色。蘇維埃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他批評經理部，在會議中，在生產討論會中，在壁報上。他有權撤消決議案，選舉和被選舉到蘇維埃去，執行無產階級的專政。連我們外國專家和工人也可以參加國家的管理工作。舉例來說，當我參加蘇維埃選舉投票的時候，我此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在美國我沒有投過一次票，因為我是英帝國的一個屬民。

在蘇聯生活是如此活躍所以一個人不得不迅速地學會了俄文。可是在美國我卻曾遇見一個捷克人，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還沒有把英語學好。因為他在那兒過的是異邦人的生活。在美國，來自意大利，保加利亞，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移民們

中間，像這樣的人不知多少——雖然能夠說話，卻只能算是隱吧。

我到過許多蘇聯工廠，看見了無產階級追求技術和文化之盡美盡善的可驚的力量。蘇維埃將要征服一切！這是毫無可疑的。我們外國工人，既已在此發現新的真正的鄉邦，就會為共同的目標而貢獻全力，遇必要時，並將起而保衛蘇聯。

一個人要能為他的理想而奮鬥！

印度：雷·麻拉達拉——列甯格勒「卡齊斯基工廠」工程師

知識之門

一九二一年我生在波斯（現已恢復舊名伊朗）烏米亞城。當我九歲時我們全家遷居土耳其卡斯城，到一九二二年，我們——母親，三兄弟，兩姊妹——來到列寧格勒。

這個小波斯人不懂一句俄語，也不懂得乘法表。十四年過去了。這小波斯人在一個異鄉長大了，這異鄉已經變成他的第二故鄉。他已在一個蘇維埃普通學校修完功課，他已從一個蘇維埃大學畢業。如今他已在「紅曙」電話機工廠當了兩年工程師。拉希姆，塔利——凡蒂是一個波斯人，但他是一個蘇維埃公民，新時代人物的一員。

這就是你可以在蘇聯知道的關於我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僅止於事實的敘述。我覺得對這些事實略加詮釋會更加有趣，更加有益。

下面便是：——

在波斯是沒有工藝學院的。凡要在這樣地方學習的人必須到外國去，而只有富家子弟才有這種特權。不錯，波斯政府是担任這筆費用的，但它總是只選那些特權階級——可汗們和富商們——的子弟送去留學。至於一個貧窮的波斯人，縱使他是一個天才吧——知識之門對他是關閉着的。

我記起我哥哥告訴我的一個故事。我們的一個親戚，僑寓巴黎的一個政治亡命客，用他的錢把我哥哥接出波斯並送他到沙皇俄國去讀書。我哥哥到了聖彼得堡，向「電氣工藝學院」報名。結果是碰壁：「我們不收回教徒！」

一九二九年，我在蘇聯修畢普通課程準備競賽考試的時候，仍是向這一所「電氣工藝學院」報名，不過這時它已變成一所鍛鍊無產階級工程師的熔爐了，而且加上了榮耀的列甫的名字。

大家都曉得，蘇聯工藝學院的入學優先權是給予工人，農人和腦力勞動者的子弟的。無怪乎在請求入學的時候要繳呈好些證明文件。可是我呢，卻一張出生

證明書也沒有。在波斯並沒有俄國那樣的社會身分登記制度。我怎樣能證明我是一個農人的兒子呢？看情形已是毫無希望。但是註冊委員會決定對這事件放大眼光，不管還有大批的候選人，就立刻准許我入學了。不但此也——他們並且還給我一筆津貼，在我全部學程中我都領得它，沒有間斷。

我在蘇聯的十四年中不下十年是全都花費在學習上面。我受得免費教育，我受得扶助。我要怎樣才能報答蘇維埃政府呢？我要在一個蘇維埃工廠裏面爲工人們的共同利益而忠誠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全部知識，全部靈魂，都付與我的工作。

有時候我想着：假如我留在波斯那會怎麼樣呢？回答是明明白白的——我決不會受得教育，而現在一定是在一個英國煤油租借區當一名普通工人。我決不會從一個普通工人的地位擡升上去。波斯政府與英國公司所訂的契約會有這麼一條：英國方面沒有把自己的普通工人輸入波斯之權。你懂得的——只是普通工人呀！別的人才英國人都可以帶來的。站在英國的立場，給波斯人以專門知識，使波

斯人成爲熟練工人，工頭，技師，那是不利的，在政治上不利的。因此——在一個煤油租借區從事於污濁的，疲乏的，報酬微薄的，奴隸般的勞動，就是我在故國所能希冀的一切了。若是要換換口味的話，也不過是在市場上盤着兩腿，從朝至夜做一些小買賣而已。（波斯人有百分之十二以上以商販爲業。）何等可憐的生涯啊！

晚上，坐在家中的桌旁，我望着我的妹妹蘇那。她剛剛修畢普通課程，正準備按照志願升學——進電氣工藝學院或探鑽學院。她有選擇的完全自由，並且有絕對的把握能夠受得一種專門教育。蘇那·塔利——凡蒂將是第一個受得此種教育的波斯女子，在故國波斯，即使是財富也不能爲一個女子打開教育的門戶，因爲宗教不允許。

伊期·拉希姆·塔利——凡蒂——列甫格勒「紅曙」工廠工程師

武裝保衛蘇聯

早幾天以前我接到一封信，是從意大利匹德蒙可尼鎮區寄來的。它告訴我那裏的工人每兩週所得僅五——六個利拉（意國貨幣名），這點點薪金就是買紙煙或烟草都不夠。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失業和貧困之國。在汽車廠，織物廠，絲廠的女工們尤其困苦，因為這些工廠被經濟恐慌打擊得特別厲害。在意大利只有一種工業在迅速發展——戰爭工業。

在蘇聯，各部門的工業都是平均發展，適應着工人階級的任務和需要。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廠的例子，告訴了我們蘇維埃政府對於改良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經濟狀況——特別是對於貨物的流通和輸送，是如何注意。

汽車工廠每點鐘的工作都在改進着蘇聯國民的生活。每天有許多的機器離開我們廠中的輸送帶，去爲工人，集體農民和他們的企業服役。

汽車廠的例子又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使得男女工人的生活起了多大的改變。蘇聯的無產者們享有休假，游息，醫藥治療，兒女教育等權利，尤其重要的是他們不知有失業。在意大利卻是完全不同的。

蘇聯是一個和平勞動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是隨時都準備着自衛的。

不僅是蘇聯所有的工人和集體農民，而且連世界各國千百萬的男女工人們都將保衛蘇聯。

我的兒子基烏色卜已在紅軍入伍。他努力學習，我對他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和我的兒子都願手執武器保衛蘇聯。

意大利：瑪爾契利——高爾基「莫洛托夫汽車工廠」聯合工場女工

譯 後 記

蘇聯以外的人來寫蘇聯，無論怎樣周到，怎樣精細，總難免有隔閡而不親切的缺點。現在我所介紹的這本『在和平勞動之國』的作者們沒有一個是蘇聯國民，都是屬於蘇聯以外的各國。然而這本書卻能完全不『隔』，因此誰都會承認它是親切有味的。其所以能夠如此，乃是因為這些作者們不是蘇聯匆匆一過，走馬看花，也不是僑寓雖久而始終維持着客人的身分如使館人員那個樣兒。不是的。他們都是積極參加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人物。他們深入蘇聯生活的中心——各個巨大的工廠及其附設機關。他們寫蘇聯的事就是寫他們自己的事，所以寫得那麼熱情，那麼親切。但他們仍是以外國人的身分來寫的；他們來自各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每一個人有各自不同的一段過去，有各自不同的一種比較，所以寫得那麼精審，那麼真實。他們能夠指出在蘇聯生活和工作中那些真

正的缺陷，同時也能夠指出那些最值得注意的光輝的方面，——特別是那永遠迅速向上發展的偉大動力。在資本主義普遍腐敗的現代，蘇聯所最可向全世界誇耀的就是它的人民無例外地蓬蓬勃勃向上發展的熱情和力量，而這一點你在本書中差不多無論那一篇都可看得出來。雖然這本書已稍嫌陳舊了——它是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而我仍要把它介紹於國人之前者，主要的理由就在於此。另一方面，本書最有意義而且最饒趣味的地方是作者們對自己過去生活和本國情形的敘述，我想單是憑這一點就應該可以得到讀者們的歡迎了。

本書是一種軟性讀物，適合各種程度和年齡的讀者。因此它不算是一種載記或研究，它沒有圖表，數字和概括的敘述。我希望讀者把它與趙飛克先生等合譯的『蘇聯概況』合看，必可感到『相得益彰』之妙。在我的心目中，這本書可算是『蘇聯概況』的姊妹篇。

本來想寫一篇詳細的序文，但是仔細看看原編者的序文，覺得實已無另寫的必要，便將它譯了過來，放在前面。

正。

譯文的不妥之處自難免——尤其是工業方面的名詞。希望能得到讀者約匡

唐旭之 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

在和平勞動之國

著作人：唐旭之 發行人：陳劭先

實價國幣一 元 外埠另加郵運費

桂林 西成路 科學印刷廠印刷

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發行

本書保有著作權及翻印權

文233(86)甲案P₁

012(1--5000)

5154
002643

54

643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書字第四一五號



實價國幣一元

中國書店
重慶民生路六十四號
CHINA BOOK CO.
CHUNGKING